

学号: 201972017

密级: _____

长江大学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子女数量对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的
影响研究

专业领域: 农村发展

研究方向: 农村社会学

研究生: 赵怡凡

指导教师: 谢 云 副教授

姚治虎 高级经济师

论文起止日期: 2021 年 4 月至 2022 年 4 月

学号: 201972017

密级: _____



长江大学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子女数量对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的
影响研究

专业领域: 农村发展

研究方向: 农村社会学

研究 生: 赵怡凡

指导教师: 谢 云 副教授

姚治虎 高级经济师

论文起止日期: 2021 年 4 月至 2022 年 4 月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number of children on the
happiness of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eople in rural
areas

Field: Rural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Study: Rural Sociology

Graduate Student: Zhao Yifan

Supervisor: Associate Professor Xie Yun

Senior Economist Yao Zhihu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Yangtze University

April, 2021 to April, 2022

摘要

在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社会背景下，农民福祉一直是党和政府关心的重要问题，幸福感是农民福祉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十四五”规划中强调“让人民幸福是国之大者”，党和政府持续关注人民的精神生活和幸福感的提升。我国的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升，美好生活的需要，不仅需要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也需要有健康的精神生活。我国的老龄化情况不断加剧，农村老龄化水平高于整体水平，相较于城市的养老保障体系和物质条件，农村的中老年人养老在制度层面和物质条件方面都有着较大的差距，农村的中老年人的精神状况值得更多关注。“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观念，在我国根深蒂固，子女状况对父母晚年养老和幸福感存在影响，而近年来生育政策有所改变，因此子女数量对农村中老年人的幸福感影响值得探究。

通过文献梳理，本文使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家庭生育决策理论、代际交换理论和忽视变量理论作为理论依据，采用 2017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根据本文被解释变量幸福感的特征，选取了有序 Logit 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模型通过共线性检验与稳健性检验。最后根据现实状况，定性和定量的研究分析结果，提出了具体可行的政策建议。

研究发现：（1）根据全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有子女和无子女的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有区别，有子女的农村中老年人的幸福感比无子女的幸福感更高；（2）实证分析得出，实际子女数量对全样本中农村中老年人的幸福感影响存在非线性关系；（3）实际子女数量对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影响受到理想子女数量的约束，说明农村中老年人还是有自我评选的最优数量，并不是孩子越多越好；（4）分群样本检验中发现，农村中年人的幸福感受到实际子女数量和儿子数量的影响不显著，但是农村老年人同时受到两者的影响，既有儿子的“门槛效应”，也追求儿女双全的性别组合。

依据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全面放开生育政策，减轻子女养老负担；（2）落实农村儿女同有继承权，共同承担赡养义务；（3）提高养老行业服务标准，对农村养老机构进行规范化管理；（4）拓宽农民收入渠道，创新养老方式；（5）推动保险制度协作，社保商保相辅相成；（6）丰富农村精神文化生活，提高居民健康水平。

关键词：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子女数量，儿子数量

Abstract

Under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farmers' well-being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concern of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and happines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farmers' well-be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emphasizes that "making the people happy is the biggest thing in the country", and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continue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spiritual life and happiness. China's economy is developing rapidly, and people's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living standards have been greatly improved. The need for a better life requires not only a solid material foundation, but also a healthy spiritual life. China's aging situation is increasing, and the rural aging level is higher than the overall level. Compared with the urban old-age security system and material conditions, there is a big gap between the rural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eople in terms of system and material conditions. The mental state of rural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eople deserves more attention. The concept of "having more children and being blessed" and "raising children to prevent old age" is deeply rooted in our country. The status of children has an impact on parents' old-age care and happiness. However, the birth policy has changed in recent years, so the impact of the number of children on the happiness of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eople in rural areas is worth exploring.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this paper uses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theory, family fertility decision theory, intergenerational exchange theory and neglected variable theory as theoretical basis, adopts the data of China Comprehensive Social Survey (CGSS) in 2017.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ell-being of the variables explained in this paper, the ordered Logit econometric model was selected for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the model passed the collinearity test and robustness test.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and analysis results, concrete and feasible policy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According to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whole sample,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happiness of rural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eople with and without children, and the happiness of rural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eople with children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ose without children; (2) Empir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there is a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ctual number of children and the well-being of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eople in rural areas in the whole sample; (3) The influence of the actual number of children on

the happiness of rural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eople is restricted by the ideal number of children, which shows that rural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eople still have the best number of self-selection, and the more children, the better. (4) In the cluster sample test, it is found that the happiness of rural middle-aged people is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the actual number of children and the number of sons, but the rural elderly are affected by both, which not only has the "threshold effect" of sons, but also pursues the gender combination of both children and children.

According to the conclus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policy suggestions: (1) Fully liberalize the birth policy to reduce the burden of children's old-age care; (2) Implement that rural children have the right of inheritance and share the obligation of support; (3) Improve the service standards of the old-age care industry and standardize the management of rural old-age care institutions; (4) Broaden farmers' income channels and innovate ways of providing for the aged; (5) Promote the cooperation of insurance system, and social security and commercial insurance complement each other; (6) Enrich rural spiritual and cultural life and improve residents' health level.

Keywords: rural middle-aged and elderly, happiness, number of children, number of sons

目 录

摘要	1
Abstract	II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1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4
第三节 研究内容及方法	8
第四节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10
第一章 研究理论	12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12
第二节 相关理论基础	14
第二章 研究设计	18
第一节 数据来源	18
第二节 变量的选择与解释	18
第三节 描述性统计分析	20
第三章 子女数量对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影响研究的实证分析	26
第一节 模型选择与构建	26
第二节 共线性检验	27
第三节 实证分析	28
第四节 稳健性检验	36
第四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38
第一节 研究结论	38
第二节 政策建议	38
第三节 研究展望	42
致 谢	43
参 考 文 献	45
个 人 简 介	49
研究生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和版权使用授权书	50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一、研究背景

（一）政策关注

2011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把稳定物价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并出台相关政策措施，使人民生活的舒心。2011年以后，党和政府对民生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每年的两会都聚焦民生，尤其关注扶贫、养老、就业、生态等十个民生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大多社会问题的研究视角基于物质生活条件，但仅仅以物质调价和经济发展水平来反映和衡量社会问题，也有其局限性。

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的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美好生活的需要，不但要求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也需要有健康的精神生活。我国《政府工作报告》连年提及“幸福”概念，“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幸福中国”的具体图景，“十三五”期间实现了超5000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十四五”规划中强调“让人民幸福是国之大者”，党和政府持续关注人民的精神生活和幸福感的提升。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

一方面，现阶段我国居民的平均寿命不断提高，人民把追求长寿作为提高幸福感的标准之一，社会对于幸福感和获得感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国家在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让老年人拥有幸福的晚年，后来人就有未来可期”，党和国家对老年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关注度在提高。

另一方面，根据2020年的第七次人口普查公报显示，截至2020年12月10日，中国大陆地区有141178万人口，其中，60岁以上的人口比重达18.70%，65岁及以上的人口比例为13.5%，我国老龄化日渐加剧。从表1-1可以看出，2000年至2020年的三次人口普查数据中，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由10.41%增至18.70%，乡村60岁以上人口占乡村总口的比例也在攀升，由10.60%升至23.81%，超过整体水平，乡村老龄化现象日益严重；而且我国的中年人口数量基数庞大，中年人也会随着时间的发展步入老龄阶段，这将成为社会状况的发展趋势，使得老龄化现象在农村地区更加突出。

目前的状况是越来越多的父母逐渐步入老龄时代，虽然当下中国的养老保障方面正在改善，但是相较于发达国家，中国的养老体系和社会保障的发展仍存在

较大的发展和进步的空间,子女养老和家庭养老仍然是当下父母养老的重要方式。这种情况在农村地区更加突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情况不断加剧,老年人幸福感问题成为了研究热点,社会对老年人生活方面、养老方面、精神和身体健康方面的关注度也日渐提高,同时大量中年人口也将步入老年,因此,研究中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以及如何提升幸福感,对中老年人的家庭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表 1-1 人口普查中 60 岁以上人口状况

Table 1-1 Population status over 60 years of age in the census

人口普查数据	60 岁以上人口占比	60 岁以上乡村人口占比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	18.70%	23.81%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13.26%	14.98%
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	10.41%	10.60%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官网

(三) 生育观念与生育政策变化

自古以来,“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生育观念,在我国根深蒂固。随着教育的普及和人口综合素质的提高,社会上对于生男生女“养儿防老”的观念有所变化,同时对子女数量的追求也有了新的变化。“计划生育”政策时期实行的“一胎政策”,对传统家庭模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冲击了人们的生育观念。直至 2016 年国家实施“二孩政策”,人们可以自主选择是否生二胎,国家鼓励生育,实施“二孩政策”,但是我国的人口出生率不升反降,2020 年出生人口减少了 460 万。现阶段父母生育观念和生育数量会受到社会环境和家庭经济状况以及养育子女的成本等因素影响。随着老龄化情况逐渐加重,专家们对开放三胎的呼声越来越高,为了进一步改善我国人口结构、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2021 年 8 月 20 日,我国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和计划生育法的决定,出台了“三胎政策”,即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并且出台相关配套支持政策。

子女数量会对家庭的各方面产生影响,尤其是现阶段老龄化情况加剧,一个家庭的子女数量不仅会改变家庭生活质量,也会对中老年人的生活方式、养老模式、身体健康、精神健康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独生子女的家庭双方父母养老和赡养等问题中更是面临考验。究竟“多子多福”的观念在当今社会是否使用,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从传统观念上来看,“男孩偏好”的现象在东南亚地区普遍存在。在性别偏好

文化中，儿子在家担任“顶梁柱”的角色，为家庭“传宗接代”，解决家里需要体力劳动的问题；从“养儿防老”一词可以看出，传统观念中儿子对父母养老体验起着重要作用。随着时代进步和思想观念的转变，社会上对性别偏好状况也有所改善，女儿同样可以为父母养老，给家庭带来幸福。不同地区和不同群体认知状况必然有所区别，子女的性别对中老年人的幸福感也会产生影响，养儿子能不能让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提升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由于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相较于城市的养老保障体系和物质条件，农村地区的中老年人养老在制度层面和物质条件方面都有着较大的差距，农村父母养老和城市父母养老对子女的依赖程度不同，农村中独生子女养老压力更大，而这部分中老年人对子女的陪伴和情感需求更大，子女的数量就会对这个群体生活的幸福感产生影响，所以本文尝试研究农村地区子女数量对中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

二、研究目的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中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人们在物质水平达到一定水平时，会把视线转向精神层面。从社会现状来看，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的养老压力很大，农村中老年人的精神状况和养老状况更是值得关注。基于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7年（CGSS）微观数据统计数据分析和实地访谈的基础上，了解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总体状况。此研究是检验子女数量对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关系，扩展研究儿子数量对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厘清影响机制，并且结合实证结果，从代际角度提出有助于提升幸福感和促进农村养老的政策建议。

三、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第一，立足现实，运用社会学和经济学等相关理论和方法，梳理国内外有关中老年人幸福感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在现有生育政策和现实状况下，深入分析子女数量对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的内在联系和现实意义，进一步提出具有参考价值的政策建议。第二，聚焦农村中老年人的幸福感的现实问题，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结合现实的发展提炼理论，丰富了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的理论体系，进一步丰富关于农村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学术研究成果。

（二）现实意义

现实社会中的案例，有生养众多子女的父母进入中老年以后，面临可能没有子女愿意去赡养他们的情况；也有只生独生子女，父母退休后幸福养老的情况，究竟“多子”意味着父母的幸福感会更高吗？本文以农村中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基于子女数量对农村中老年人影响研究，从影响因素、影响程度和影响结果和机

理等方面进行分析处理。结合幸福感议题，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补充关于子女数量对于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研究，从而在乡村振兴这一大背景下，为提升农村中老年人这一群体的幸福感建言献策，帮助农村中老年人提升幸福感和养老方面的社会保障。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一）主观幸福感研究

学术研究角度上，幸福感的研究是跨学科的，涉及多个研究领域。在幸福感的定义上，国外学者 Diener(1985)提出主观幸福感应从认知和情感两个层面来定义^[1]。在认知层面上，Shin 和 Johnson(1978)指出幸福感即为生活满意感，是人们根据自己特有的准则，对自身生活质量的自我评价^[2]；在情感层面上，Watson(1988)认为幸福感可以视为快乐的感觉，通过积极的情感和消极的情感之间的平衡度能够体现，也就是个人的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多少比较，前者多于后者，即会感到幸福^[3]。“幸福”也被视作一种评估心理健康的形式，它包括生活的意义和目的、社会支持、社会关系和掌控感等变量。从这几个层面，可以通过不同的测量方式对幸福感进行度量，这就奠定了幸福感影响因素经验研究的基础。

（二）影响主观幸福感相关因素

国外学者的研究中，幸福感相关的影响因素理论主要分为两大类：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

其中，内部因素有：气质、健康、性别、年龄等。不同气质的人，对 SWB 体验的倾向有差异。学者 Wilson 的研究表明，被研究对象仅仅在进行自我报告健康测试的时候，个人的健康与 SWB 之间才具有较强的相关性。性别对幸福感的影响没有定论，但是男女在整体幸福感上接近平等^[4,5] (Louis 和 Zhao, 2002)。日本学者 Shimai S, Yamamiya Y, Fukuda S (2018) 基于年龄在 20-70 岁样本研究发现，年龄大的人幸福感比年轻人高，女性幸福感比男性高^[6]。年龄方面，Oswald(1997)认为年龄在不同阶段对人的幸福感的影响是不同的，其研究表明，人的主观幸福感在生命周期的曲线中呈倒 U 型，最低点出现在中年，而年轻和老年均高于中年时期的幸福感^[7]。Easterlin (2006) 的研究中，发现中年人对生活的期望比较高，因此其幸福感是生命周期中最低的阶段^[8]。

外部因素包括：工作、收入、婚姻、社会参与等因素。George 和 Brief 的研究表明，一般情况下，在 SWB 中工作热情可以被划分为工作时的心情状态和工作满意等元素^[9]。Clark 等 (1998) 提出失业则会降低 SWB，但不幸福群体的不

单单来源于失业人员，失业群体的生活满意度较低，且具有较高的自杀倾向^[10]。关于收入对 SWB 的影响研究，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分类，一类是收入变化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国外学者的研究认为，适应理论认为个体能适应一定等级水平的收入，但是人也有一定程度上的调节情绪，和重新构建对事物认知的能力；Kahneman D, Deaton A (2010) 根据其对 45 万美国人的研究，当家庭收入收入低于 7.5 万美元时，收入和幸福感之间是正向关系，超过该数值后，收入增加不会带来幸福^[11]。第二类是国家经济发展时期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Dooley, Diener 和 Suh 等学者，研究了法国、日本、美国等经济增长幅度大的国家发现其 SWB 并无增加^[12, 13]。第三类是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影响研究，认为不同富裕程度的国家的 SWB 是有区别的 (Easterlin, 2006)。关于婚姻状况对幸福感的影响，国际大范围的观察研究发现：婚姻对幸福感有积极影响，结婚的人比未婚、离异、独居、分居的人幸福感更高，但是关于婚姻对于不同性别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存在争议，究竟的对男性幸福感更重要还是女性更重要，没有定论^[14]。Shah SA, Safian N 等 (2021) 研究发现，老年人进行积极的社会参与可以提高他们的幸福感^[15]。

（三）幸福感的测量

在外文文献中，通常情况下用序数变量来衡量幸福，如“非常不幸福”、“不幸福”、“相当幸福”、“幸福”和“非常幸福”这类指代可能性的序数变量。但是，因为幸福感是属于主观感受，其测量方法在学术上没有统一的测量标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研究的日益深入，使得幸福感的测量方法和测量工具也日趋完善。

心理学文献中，有四种类型的幸福感测量方法较为突出，“专家”判断法、行为评估、自我评价以及专门开发的量表中的表现，这些测量都有相关误差。“专家”判断和行为评估方法中，误差可能来自评估者，也可能来自被评估者。自我评价是一种内部状态的测量方法，Bradburn 在早期使用了幸福的自我评价，后来开发了情感平衡量表 (ABS)，对正性情感项目分减负性情感项目分，再加一个系数 5，得分区间在 1-9 分。Beiser (1974) 在其基础上增加了第三个因素以反映幸福的性格特征。Kozma 等 (1978) 认为 ABS 的使用存在局限性，在该方法下抽样范围要求严格，而且其给分权重方法不适用于老年人口。后来纽芬兰纪念大学开发出适用于老年人的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量表 (MUNSH)，包括五个积极情感类项目 (PA)，五个消极情感类项目 (NA)，七个一般积极体验项目 (PE) 和七个一般消极体验项目 (NE)。^[16]

国外学者的幸福感测量表相关的研究中，比较被广泛接受和应用的测量表有 Bradburn (1969) 的情感量表 (ABS)，Campbell (1976) 的幸福感指数量表以及 Fazio (1997) 的总体幸福感量表 (GWB) 等。

二、国内研究现状

（一）关于幸福感的研究

学者段建华（1996）对主观幸福感的定义是：根据个人自定的标准对自身生活质量进行整体评估，评估结果作为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综合性心理指标^[17]。幸福感的评价主要指个体依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自身生活质量所做的整体评价。吴宁，戴俊明（2019）认为主观幸福感是幸福领域研究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是个体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估，其本质是对快乐的主观体验，具有总体、主观、稳定等特点^[18]。关于幸福感的研究，尉敏琦，邬家杰等学者（2020）的认为主要集中于老年人、大学生，少儿和教师等特殊群体，不同的研究对象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计量工具、以及衡量指标都有所差异^[19]。

（二）关于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

影响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复杂多样，有性别、婚姻、教育、年龄差异、工作、收入^[20]、健康^[21]、子女状况^[22]、居住条件安排^[23]、医疗和社会保障^[24, 25]、养老模式^[26]、休闲娱乐方式^[27]、信仰^[28]、家庭资本^[29]等因素。

我国对于幸福感研究的相关因素的分析中，发现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在各种数据库的研究中，我国女性的幸福感显著比男性要高，有某些不可观测的因素影响研究结果；同时，李磊，刘鹏程等学者（2017）的研究发现，社会对男性的期许比女性高，加上性别上对女性的歧视的观念，男性占有更多的优势资源，反而出现了使得男性的幸福感较低的“悖论”^[30]。孙凤（2007）的研究指出，由于女性在生活中承担的角色是照顾家庭和养育子女，职业的女性生活幸福感比职业男性幸福感低，但其工作幸福感却高于男性^[31]。向运华，李雯铮（2020）的研究指出，受过教育的农村老年人比未受教育的农村老年人更幸福，而且教育对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影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32]。关于婚姻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较少，徐福芝，陈建伟（2020）用CGSS2015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表明，婚姻对老年人的幸福感的影响正向显著^[33]。周晓光（2021）的研究指出农村未婚的老年人生活质量和幸福感都处于劣势^[34]。张再生、达娃、杨若愚（2018）分析宗教信仰、社会支持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得出结论：宗教信仰与主观幸福感正向关，但是社会支持力度的影响高于宗教信仰^[35]。王健，孟庆跃等（2009）采用昨日重现法调查，发现农村居民的休闲娱乐对幸福感影响很高，而且增加休闲娱乐项目，也会促进幸福感的提高^[36]。

王晓慧（2021）指出增强老年人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是我国老龄事业发展的目标^[37]。幸福感受很多因素的影响，苏钟萍和张应良（2021）认为收入水平、社会公平认知对幸福度有影响，并且会由于城乡条件不同，不同户籍人口对幸福

感的评价也不同^[38]；李芳芝，张焕明（2021）认为代际流动有助于提升主观幸福感，但是代际流动并非越高越好，而是存在一个阈值，过高的代际流动不利于主观幸福感的提升^[39]；张文超，吴远洋等（2021）的研究中，中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有助于提高幸福感水平^[40]。彭春花，陈有国等人（2020）的研究表明可以通过培养老年人积极的过去时间观、享乐主义、现在时间观以及未来时间观，形成平衡时间观，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41]。学者资树荣，张姣君（2020）认为文化消费活动频率与农村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文化消费活动的频率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主观幸福感均存在正向影响，但对高收入组的居民幸福感影响不显著^[42]。

（三）子女数量对中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我国历来就有“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观念，从传统观念角度看，父母的养老保障和幸福度与子女数目呈正相关关系，子女数量越多，父母养老越有保障，幸福度也越高。张欣（2017）运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定性访谈中得出：传统“多子多福”观念在老年人的观念中已经弱化，而多子女会明显降低中年人的生活满意度^[43]。“多子多福”“养儿防老”在儒家传统孝文化影响的生育观念中，代表着生育作为一种投资行为，这种投资行为将会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 and 主观幸福感，生育子女的数量越多，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就更加有保障，主观幸福感也就越高。谭远发，权力（2020）的研究证明子女数量、质量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正向相关的关系，且这种相关关系存在性别倾向性，同时子女数量、质量又通过代际支持间接影响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44]。闫晓娜（2015）认为家庭代际关系是影响中老年人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父母得到的情感支持是持续增强的趋势。年龄越大，得到的情感支持越多；子女数量增加，情感支持增加；性别和文化程度对情感支持没有影响^[45]。

宫汝娜，张涛（2020）的研究表明：孩子数量增加会降低家庭生活质量。与独生子女家庭相比较，生育“二孩”会增加家庭的发展消费支出；而消费的角度看待生活质量时，孩子数量多会降低家庭生活质量；从心理的角度分析，孩子数量的多少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不明显^[46]。孙晓冬，赖凯声（2020）研究子女性别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时发现，有子女以及多子女显著提升了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而且成年子女对老年人的精神健康具有积极作用^[47]，而陆方文，刘国恩等（2017）根据 2008 年的 CGSS 数据分析发现，第一胎的子女性别对父母的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子女成年结婚生子时，女儿给父母带来的幸福感更高^[48]。李雯铮（2019）研究发现，女儿数量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正向显著，而且生育女儿对母亲的影响更大^[49]。刘生龙，胡鞍钢等人（2020）认为相对于生育一个孩

子而言，多子女的农村老年人的精神状况更好，他们感到负面情绪的概率更低，能更明显的感受到幸福，幸福感更高。相较于生育多个孩子的父母而言，当独生子女为女性时，老年人的精神状况明显更差^[50]。关于子女受教育程度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后来的学者高建新，左冬梅（2009）通过对安徽省巢湖市抽样调查统计和实证分析发现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存在性别偏好，与儿子的教育程度呈显著正相关，但与女儿的教育程度无显著相关^[51]。

三、文献评述

基于对上述文献的梳理和分析发现，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视角都各有迥异。国外对于幸福感内容的研究起步较国内早，主要侧重于主观幸福感（SWB）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更早的关注到主观幸福度对与人们精神状况和精神生活的影响。这些差异是由于不同国家的经济、文化的不同所导致的差异。国内对于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等精神文化生活的关注度在不断提高，之前大多是研究社会现象、文化发展、经济管理等方面对人们幸福的影响，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发展，研究对象开始细化分类，以学生、教师、老人、农民等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国内的相关研究中，有从子女角度的因素对父母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内容丰富，自成体系，为研究子女方面对父母幸福感提供了参考，但是考虑到2016年国家出台了“二胎”政策，人们思想观念上可能会发生变化，仍然存在完善的空间。所以本文基于研究时能获得的最新数据进行分析，结合对部分农村中老年人的访谈调研，响应党和政府提高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参与感的号召，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为探索子女对提高农村中老年人精神文明和幸福感提供视角补充。

第三节 研究内容及方法

一、研究内容

本文以乡村振兴战略为背景，探索子女数量对与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中的3704份数据，运用描述性统计对问卷数据进行分析，在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stata15.1计量软件，通过多元有序Logit计量方法做实证研究，从而分析出子女数量对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最后根据数据分析结果提出针对性的建议对策。研究分为5个章节，具体内容如下：

绪论。主要介绍本文选题的背景、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并进行简要述评。阐述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目标、研究内容，拟采用的研究方法及创新点与不足。

第一章，幸福感的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主要介绍幸福感、农村中老年人、子女数量等相关概念的界定，借鉴并介绍马斯洛需求理论、代际交换理论、生育决策理论和忽视变量理论；解释子女数量对农村中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机理。

第二章，研究设计。包括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解释何描述性统计部分。描述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的状况。主要介绍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基本情况，基于筛选出的微观数据对子女数量对农村中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总体状况进行描述。

第三章，实证分析与检验。选取各个变量指标并且构建合理的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与检验。首先共线性检验，再根据模型进行回归，最后进行稳健性检验，详细分析子女数量对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

第四章，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主要介绍基于统计数据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并在此基础上，并结合调研访谈中农村中老年人的观点与咨询得到的建议，有针对性的提出提升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的相关对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二、研究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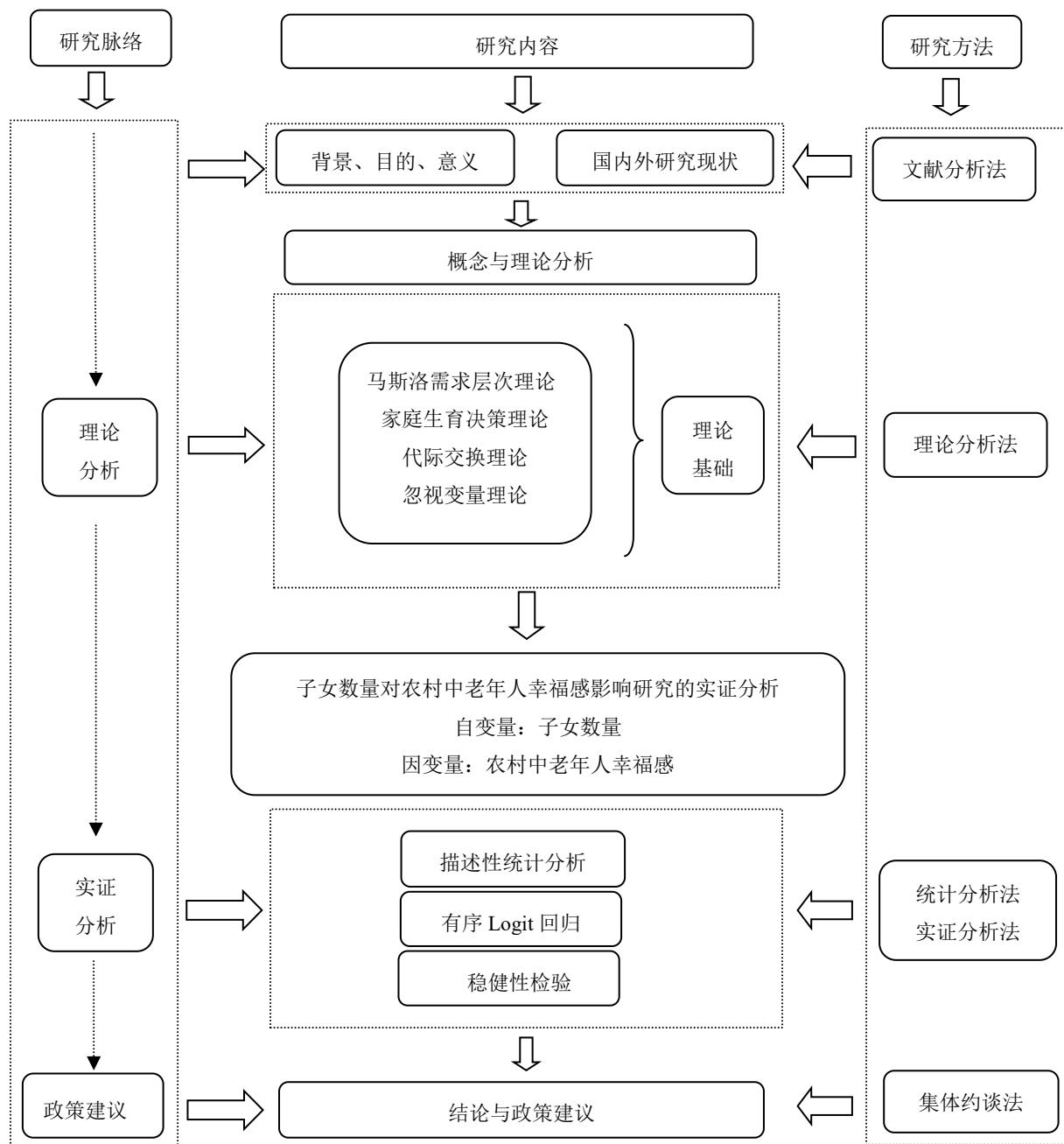
1.文献研究法：运用查阅大量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方法，结合现有的研究成果，了解子女数量和农村中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在学者的研究历史的基础上结合现状，为本文研究提供借鉴与研究依据，奠定本文的理论基础。

2.实证分析法：由于研究分析的需要，本文即将采用实证分析法对子女数量影响农村中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并且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对相关概念和理论进行定性分析，对调研数据构建计量模型，运用 Stata15 等软件进行定量分析。

3.集体访谈法：虽然本文使用的是统计数据，但是在研究阶段也进行过部分地区的社会调研，主要针对农村中老年人进行访谈，对农村中老年人的幸福感基本情况、子女数量等形成直观、更加贴合实际的了解，为论文的写作提供现实情况的相关资料。

三、技术路线图

本文的技术路线图见图 1-1。



第四节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一、可能的创新之处

研究视角可能存在创新。从现有的文献来看，有社会支持、养老模式和收入差距等角度对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或者主观幸福感进行分析，这些文献大多数是站在宏观的角度对影响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因素进行整体分析研究，本文采用子

女数量视角对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进行分析。而且考虑到老龄化趋势，加入了农村中年人的样本，以便于分析农村中年和老年群体的子女数量和儿子数量对其幸福感影响的区别。

本文在研究时，从子女对父母养老作用的角度考查子女数量对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检验这两者之间存在的非线性关系，克服了已有研究中两者线性关系的局限；理论运用可能存在创新，在相关的文献阅读中，文章运用了幸福理论的相关内容，深入了解了幸福这一概念的内涵，在幸福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实证分析与检验，研究得出对策建议，从而在子女数量的角度上为实现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最大化提供新思路。

二、不足之处

因为本文的研究选用的是 2017 年 CGSS 的统计数据，虽然本文已尽力结合时间安排和数据更新时间采用新数据，但从时间上看，数据可能仍然不够及时；本文分析子女数量对的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影响的情况，在变量选取的过程中，核心解释变量分为两类，分别为子女数量板块和儿子数量板块；控制变量选取较多，已尽量做到科学合理，但仍可能存在偏颇和遗漏，有待进一步的完善。根据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实证结果最后得出的政策建议可能存在创新性不足的情况，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根据实际状况的发展不断的完善和修正。

第一章 研究理论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一、幸福感

（一）幸福感的概念

幸福这一命题，古老又常新，不同时代的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和讨论，学者的视角与观点同时也为人们追求幸福提供方法论和参考途径。幸福感作为社会心理体系中的一部分，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认为幸福是“最高的善”，不局限于身体的快乐和感官的享受，主要在乎德行。弗洛姆（Fromm）对幸福的定义强调实现人生积极性、创造性体验。幸福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每个人都想追求幸福，幸福是一种主观的情绪体验。

心理学上，一般将幸福感分为两大类，分别是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主观幸福感（简称 SWB），主要指人们对自身生活状况的整体认知与评价，把快乐定义为幸福（Diener, 1997），解释人们对所发生的事情的情绪与认知上的加工。具有主观性、稳定性、整体性。主观幸福感的测量指标包括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生活满意度是认知因素，后两者的情感平衡因素，生活满意度独立于后两者。随着时代发展，评估指标趋于整合，评估方法多样化。通常学者用生活满意度作为主观幸福感的衡量指标。心理幸福感（PWB）是当代心理学中幸福感研究的另外一个方向，侧重在未来，强调自我实现和评价的自主性，是从个人发展、自我实现和人生意义的层面去理解。Carol D. Ryff 认为幸福并不等同于快乐。心理幸福感主要以外界的标准和价值体系，即观察者对行动者的描述来判断个体是否幸福。

一般而言，幸福感是人在自身获得了安全感和满足感后产生出来的积极愉悦的情绪。关于幸福感的测量研究，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对幸福感赋予的内涵不同。Joseph Raz (2004) 认为，幸福感在于全心全意和成功地追求有价值的关系和目标。本文立足于现实和数据来源，所研究的幸福感更接近于主观幸福感，用问卷中的问卷中“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来衡量，说明一个人在某个时间点上对生活的整体感觉。

（二）幸福感的测量

幸福这一概念的理解涉及多个领域，包括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等多个领域。所以，对幸福感这种主观感受来测量是一个重大挑战。尽管东西方学者对幸福感研究历史已久，但是对于幸福感的测量仍未有一个统一的测量工具，关于对幸福感是测量，有美国国立卫生中心制定的总体幸福感量表（GWB），即通过个体评价对幸福的陈述来确定其总体幸福感；认知评估模式是把生活满意度作为幸福感

的测量指标，使用最为广泛是生活满意测量是《总体满意感量表》(Diener 等, 1985)；满意度研究领域中，由邢占军等 (2001) 制作的《满意度调查表》涉及 5 个维度，包括总体满意以及物质生活满意感、社会关系满意感、自身状况满意感、家庭生活满意感、社会满意感；情感评估测评模式中，Bradburn (1969) 把幸福感定义为正负情感之间的平衡。

在本选取个人对生活整体感觉来衡量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幸福感从 1-5 分别表示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自评分数越高，说明幸福感程度越高。

（三）影响幸福感的因素

幸福感作为主观评价，受到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有个人特征:性别、年龄、民族、文化水平、健康状况、婚姻状况等；也包括经济因素：个人收入、就业状况、家庭收入等、以及政治因素和心理因素。

二、农村中老年人

人类有幼年、少年、青年和中老年。一直以来，人们对中老年的界定存在争议。有人认为退休就是进入老年人阶段，也有人在年龄划分上定义中老年。通常情况下，根据生命历程的发展，中老年阶段就是中青年阶段之后的阶段。但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改善和医疗健康水平的提高，人类的生命周期变长，不同地区和圈子用年龄来划分生命历程阶段的界限有所差异。按照我国的国家标准，拥有农村户籍，年龄在 60 岁以上的农民能够领到养老金。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划分，44 岁以下的人群为青年人，45 岁至 59 岁的群体为中年人，60 岁以上的群体称之为老年人。因此，在本文中，将 45 岁以上的农村居民定义为农村中老年人，45 至 50 岁的农村居民定义为农村中年人；60 岁以上的农村居民定义为农村老年人。

三、子女数量概念界定

在本文中，主要用子女数量包括实际子女数量、儿子数量研究其对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状况。

（一）子女数量

子女数量方面，包括实际子女数和理想子女数量。根据受访者目前拥有的实际儿子数量和女儿数量来观测，具体包括生育的所有子女以及收养的子女个数在内。理想子女数量就是受访者期望拥有的子女个数，也就是问卷中“如果政策允许，您希望有几个孩子，其中几个男孩，几个女孩”。

（二）儿子数量

为考查性别偏好方面对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根据农村中老年人实际拥有的孩子的性别进行区分为儿子和女儿，其中包括没有儿子的情况，同时还引入了理想儿子数量进行分析。

第二节 相关理论基础

一、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Hierarchical theory of needs) 是马斯洛与 1943 年提出的, 用来解释关于需要结构的理论。通常将马斯洛需求层次分为 5 个层次: 生理层次 (呼吸、食物、水等)、安全 (人身、财产、家庭等)、爱与归属 (友情、爱情、亲情)、尊重 (自尊、信任、尊重等) 和自我实现 (道德观、创造性、自觉性等), 如图 1 所示。马斯洛需求理论认为, 人的需求和欲望是与生俱来的, 人们需要动力实现需求。需求也有优先级, 低级需求关系到个体生存, 当低级需求得不到满足时, 生存会受到威胁。只有满足了低级需求, 人才会追求高层次, 满足高层次需求。

本文研究的是子女数量对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 这涉及到农村中老年人需求中的不同层次。尤其对农村老年人来讲, 很难同时满足 5 种需求, 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 身体机能一旦丧失, 生理需求都需要人协助实现; 能够自理的农村中老年人才能追求爱和尊重以及自我实现, 既能够满足自己对子女数量的需求, 又能够实现自身的幸福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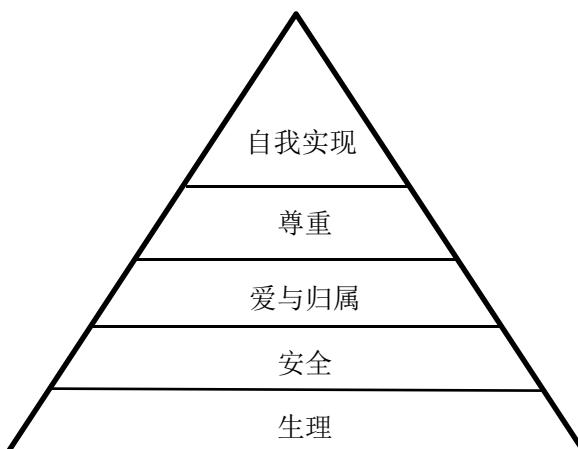


图 2-1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Table 2-1 Figure 1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通常情况下, 孩子被称为“爱的结晶”, 但其实父母生育孩子的行为也是在满足自身对于孩子的需求。拥有孩子可以满足父母对孩子这一物质的需求; 在传统观念下, 拥有孩子这一身份可以让自己有“社会面子”, 如果有儿子, 实现“传宗接代”的想法, 让自己被尊重甚至达到自我实现的层面; 养育孩子的过程能够让自己获得快乐于孩子的爱, 这能让父母爱于归属层面的需求被满足; 父母在年老时, 如果无法自理, 还能够通过子女来实现自己生理层次和安全层次的需求。不

同层面的需求能否被满足，这对于父母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和积极情绪或消极情绪的体验是有影响的，从而通过子女数量和性别影响父母对自身幸福程度的评价。

二、家庭生育决策理论

家庭生育决策理论用微观经济学的消费者行为理论来分析生育，把孩子当作特殊的消费品，满足个人和家庭的消费需要，生育行为就是家庭对孩子需求的理性经济反应。研究家庭生育决策的众多学者中，哈维·莱宾斯坦（Harvey Leibenstein）的影响力较大，是哈佛学派的代表人物。基于微观家庭视角，莱宾斯坦在分析人口和经济的关系时，从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角度出发，对家庭生育决策的“成本——效用”分析方法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莱宾斯坦的分析方法将生育效用分为生育正效用和生育负效用。正效用包括心理、情感、养老保障等效用；负效应主要是养育子女需付出的成本。正负效用之和决定家庭生育决策，如果和为正，就增加生育，和为负，就减少生育。

家庭生育决策理论的影响因素与家庭收入变化相关。孩子能满足家庭的生育需求，而家庭收入会约束孩子数量，家庭只能在收入和孩子价格约束下，选择最大数量，实现效用最大化。把孩子作为“正常品”看待，孩子家庭收入增加，则消费者希望拥有更多的孩子，反之，则减少孩子数量。但现实状况中，很多家庭的收入增加，孩子数量却没有增加，还出现了低生育率。该理论解释为，从孩子满足父母欲望和效用上看，孩子数量和质量之间具有替代关系。除此之外，家庭生育决策理论与孩子的净价格、其他商品的相对价格相关，也与相对于孩子对其他商品的偏好程度有关。

在本文的分析中，将家庭收入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来分析子女数量对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一般而言，心理学中当某种需求被满足时会产生积极情绪。家庭生育决策理论中，把孩子看作特殊的消费品，以满足个人和家庭的需要，生育效用则需要通过正效应和负效应之和衡量。而生育决策理论中，生育数量会受到家庭收入的约束，也受到孩子的净价格、其他商品的相对价格、相对于孩子对其他商品的偏好程度的约束。因此根据理论基础，在被现实条件约束的情况下，子女数量的多少，会影响父母的养育成本，从而影响父母生活水平与其幸福感效用。

三、代际交换理论

代际交换理论中的“代”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自然属性中的“代”是辈分关系，社会属性中的“代”则具有社会和文化的内涵。在本文中的代际交换理论就是指辈分之间的交换，即子女和父辈之间抚养关系的交换，父母在孩子年幼的时候抚养孩子，子女有了经济能力在父母老的时候抚养父母，这两者之间抚养与被抚养的关系就形成了代际交换。这种交换既可以是经济交换，也可以是生活

交换和精神层面的交换。

学者费孝通认为西方的代际关系是上一代抚养下一代,而下一代抚养下下代,并不赡养上一代,这种模式是“接力模式”,在我国的代际关系是上一代抚养下一代,下一代赡养上一代的“反馈模式”代际交换理论将亲子之间抚养与赡养看作是一种资源的代际交换,这种资源包括但不仅限于赡养和抚养这种最基本的交换,还要情感性、文化资本等无形交换(郭于华,2001),交换的各个主体都有自己的诉求和利益追求。代际交换理论中的“反馈模式论”,认为每一代都会在成年后赡养上一代,学者阎云翔在2005年的研究中认为现阶段我国农村代际间的交换存在着新型的互相报答的逻辑,也就是说,当父母对子女好,子女才会对父母履行赡养义务,父母对子女不好,子女就会减少应履行的义务。

本文中是研究子女数量和性别对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用代际交换理论来观察父辈“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下,儿女状况是否会通过反馈来影响父辈的幸福感体验。子女对父母的反馈中,不仅包含着赡养义务,更包括子女与父母之间一些无形的文化和情感等资源的交换。当子女带给父母的反馈是正向反馈时,会给父母带来精神上的愉悦和物质上的满足,促进父母幸福感的提高;反之,则会给父母带来消极情绪,降低父母的幸福感。因此在代际交换理论的角度上,分析子女的存在作用,其对父母的赡养和精神支持的对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状况。

四、忽视变量理论

幸福经济学是决策单个主体对人生选择的学问,包括幸福、主观幸福感的经济学的概念,在经济学的假设下,研究如何实现理性约束条件下的幸福最大化。随着“伊斯特林悖论”的提出,幸福经济学也不断发展,国内学者陈世清对幸福经济学的定义是把人的幸福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标准和目的的经济学。^①与“伊斯特林悖论”相关的理论大致分为两类,即忽视变量理论和比较理论。忽视变量理论认为经济学上关注的对幸福感影响因素中,多注重收入、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富,忽视了其他重要的影响因素。

现有的研究中,得出了收入相关变量与幸福感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随着研究的深入与拓展,学者们发现了一些与收入无关的其他因素,这些因素也会对个人的幸福感产生影响,如家庭、婚姻、健康、社会和自认因素等。虽然在幸福经济学中,与收入相关的研究和讨论较多,但是存在很多被忽视的因素,这些因素与收入不相关,却直接影响人们的幸福感。如在家庭层面中,有个人观念、婚姻、孩子等隐形因素,也有学者对这些隐形因素进行论证分析,因此,个人的幸福感不仅仅受到收入这一显性因素的影响,还有其他被忽略的因素。

^① 陈世清.《幸福经济》,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5.5。

本文的研究中，基于满意忽视变量理论和幸福经济学相关内容，选取研究子女数量对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同时参考这些研究与理论进行了变量的选取，尝试在幸福相关的理论基础上，研究如何实现农村中老年人的幸福最大化和解决养老问题。

第二章 研究设计

第一节 数据来源

一、数据来源

本次研究采用的是 2017 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英文缩写为 CGSS，该调查最早开始于 2003 年，是我国最早的综合性、连续性调研项目。目前数据库已经完成 CGSS 第一期（2003-2008 年）和第二期项目（2010-2019 年），除个别年份未执行调研项目及未对外公布数据外，该数据库系统全面地收集社会、家庭、个人等数据，属于高质量数据库，样本代表性较好，故选择了 CGSS2017 的数据。

第二节 变量的选择与解释

一、样本选取

CGSS2017 的数据样本量大，问卷设置的内容较多，在调研员调研时，部分数据出现不完整的情况，因此基于本文研究需求，为了保证实证结果的有效性和可靠性，针对数据出现的问题进行逐步筛选，最终选出合适的农村中老年人样本。

首先，筛选出合适的被解释变量：关于幸福感的问题有两个，其中一组有关主观幸福感的调研题目靠后，很多受访者并未填写，综合比较两组数据和问题内容，选择出“幸福感”这一被解释变量数据，然后剔除选择“不知道”和“拒绝回答”以及空白的样本。

其次，筛选出合适的解释变量：为解释子女数量对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本文的解释变量分为两部份，分别是子女总数部分和儿子数量部分，变量主要是从问卷中有关子女数量的问题提取和筛选出的。同时剔除选择“不知道”和“拒绝回答”以及空白和异常值的样本。

再次，筛选出合适的控制变量：结合参考文献中其他专家学者的研究，农村中老年人的幸福感除了会受到子女数量的影响，还会受到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及其他因素的影响，故选择出本文研究所需的控制变量，剔除选择“不知道”和“拒绝回答”以及空白和异常值的样本。

最后，将 CGSS 总样本中将非农业户口的样本去掉，同时也将年龄在 45 岁以下的样本去掉，最终得到了 3704 个有效样本。

二、变量定义

本文以农村中老年人为研究对象，运用 CGSS2017 的微观数据，探究子女数量对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对本文选取的变量指标的定义说明如下：

（一）被解释变量

文中用到的被解释变量是农村中老年人自评生活是否幸福（Happiness），现有的研究中，有采用三分法、五分法和十分法测量方式，所测量的结果有较强的信度和效度。本文根据问卷的设置和文献的借鉴，将受访者对自身的生活幸福状况的综合评价选取了5分法量表法测度^[52]，对应问卷中的问题“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1-5赋值分别表示“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比较幸福、非常幸福”。

（二）解释变量

子女数量对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中，解释变量分为两部分，其中，子女数量平方项、实际与理想子女数量关系变量、有无儿子变量、实际与理想儿子数关系变量、儿女双全变量是根据问卷中实际子女数量和理想子女数量问题得到的数据判断计算得出。

在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与子女数量关系的有序 Logit 模型中，解释变量分别是“实际子女数量、子女数量平方项、实际与理想子女数交互项（即实际子女数量*（实际子女数量-理想子女数量）^2）。

在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与儿子数量关系的有序 Logit 模型中，解释变量分别是：有无儿子变量、实际儿子数量、实际与理想儿子数交互项（即实际儿子数量*（实际儿子数量-理想儿子数量）^2）、儿女双全变量。

（三）控制变量

借鉴崔红志^[53]、张凌霜^[54]、赵一凡^[55]等学者的研究，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农村中老年人的个体特征、保险购买情况、生活状况主观评价。其中，个体特征变量有：性别、年龄、的性别、年龄、民族、宗教信仰、政治面貌、婚姻状况、住房状况、受教育程度。主观评价变量包括：身体健康自评、家庭经济情况自评，其中健康自评变量的选取是参照张海峰等（2020）学者的文献选取，自评结果的赋值范围是1-5，表示由差到好的健康程度^[56]。社会保障项目参与情况包括：社保养老（即：城市/农村基本养老保险）与商业养老保险购买情况。具体赋值参考表3-1。

表 3-1 变量解释

Table3-1 variable interpretation

变量名称		赋值情况
被解释变量	幸福感	非常不幸福=1；比较不幸福=2；说不上幸福不幸福=3； 比较幸福=4；非常幸福=5

解释变量	实际子女数量	由问题“请问您有几个子女（包括继子继女、养子养女在内，包括已去世子女）？可知
	子女数量平方项	由实际子女数量的平方得出
	实际与理想子女数关系变量	由实际子女数量*（实际子女数量-理想子女数量） ² 计算得出
	有无儿子	有=1；无=0
	实际儿子数量	由问题“请问您有几个子女（包括继子继女、养子养女在内，包括已去世子女）？可知
控制变量	理想儿子数量	由问题“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您希望有几个孩子，其中几个男孩，几个女孩”可知
	实际与理想儿子数关系变量	由实际儿子数量*（实际儿子数量-理想儿子数量） ² 计算得出
	儿女双全	儿女双全=1；其他=0
	性别	男=1；女=0
	年龄	依据数据赋值
受教育程度	民族	汉族=1；其他=0
	宗教信仰	有宗教信仰=1；无=0
	婚姻情况	在婚=1；其他=0
	政治面貌	党员=1；其他=0
	住房情况	拥有住房产权=1，其他=0
身体健康状况	养老保险	参加=1；没有参加=0
	商业养老保险	参加=1；没有参加=0
	家庭经济情况	很不健康=1；比较不健康=2；一般=3；比较健康=4；很健康=5
	资料来源：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远低于平均水平=1；低于平均水平=2；平均水平=3；高于平均水平=4；远高于平均水平=5

第三节 描述性统计分析

一、全部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根据从 2017 年中国社会调查（CGSS）筛选出的 3704 份有效数据，本文采用

统计学中的平均值、标准差、最大值、最小值的方法对所选取的标量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3-2 全部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Table 3-2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all variables

变量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幸福感	3704	3.7505	0.9110	1	5
实际子女数量	3704	2.3847	1.2314	0	11
子女数量平方项	3704	7.2028	8.0650	0	121
理想子女数量	3704	2.3850	1.0549	0	10
实际与理想子女数 关系变量	3704	4.7613	20.7761	0	539
有无儿子	3704	0.8629	0.3441	0	1
实际儿子数量	3704	1.2873	0.8587	0	6
理想儿子数量	3704	1.2522	0.6930	0	10
实际与理想儿子数 关系变量	3704	1.3110	6.3760	0	150
儿女双全	3704	0.5753	0.4944	0	1
性别	3704	0.4711	0.4992	0	1
年龄	3704	60.2586	10.1618	45	95
民族	3704	0.9104	0.2857	0	1
宗教信仰	3704	0.1139	0.3178	0	1
婚姻情况	3704	0.8178	0.3861	0	1
受教育程度	3704	1.4171	0.6404	1	4
政治面貌	3704	0.0499	0.2179	0	1
住房情况	3704	0.5526	0.4973	0	1
养老保险	3704	0.7217	0.4482	0	1
商业养老保险	3704	0.0291	0.1683	0	1
健康状况	3704	3.0391	1.1306	1	5
家庭经济情况	3704	2.3494	0.7591	1	5

资料来源：2017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二、子女数量与幸福感状况的统计分析

筛选后的数据经过整理后，由表 3-2 可知，对于被解释变量的幸福感来看，

农村中老年人的幸福感整体比较高, 均值为 3.7505, 标准差为 0.9110, 幸福感在一般水平之上。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的情况数据整体分析如图 3-3 示, 感觉到“非常幸福”的比例为 15.71%, 有 73.5% 的农村中老年人能明显的感觉到幸福这一体验, 存在 2.24% 的农村中老年人感觉“非常不幸福”。

表 3-3 全样本幸福感状况

Table 3-3 Happiness status in the full sample

	非常幸福	比较幸福	说不上幸不幸福	比较不幸福	非常不幸福	合计
频数	582	2141	539	359	83	3704
比例 (%)	15.71	57.80	14.55	9.70	2.24	100

资料来源: 2017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一) 实际子女数量与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

根据子女数量看, 有子女的中老年人占总样本的 98.22%, 没有孩子的农村中老年人极少。就实际子女数量来讲, 实际子女数量的均值为 2.3847, 最大值为 11, 标准差为 1.2314, 说明大多数农村中老年人养育两个孩子, 农村中老年人理想孩子数量为 2.3850, 标准差为 1.0449, 理想子女数量近乎等于实际子女数量, 说明农村中老年人实际生养子女的状况与理想状况基本相符。实际子女数与理想子女数的关系变量中, 样本均值为 4.7613, 标准差为 20.7761。

表 3-4 不同子女数量的父母幸福感对比

Table 3-4 Comparison of parental happiness with different numbers of children

无子女父母 (第一组)		独生子女父母 (第二组)		有两个孩子及其以上的父母 (第三组)		有三个孩子及其以上的父母 (第四组)		
频数	比例 (%)	频数	比例 (%)	频数	比例 (%)	频数	比例 (%)	
非常幸福	5	7.58	98	13.32	479	16.50	256	18.66
比较幸福	27	49.91	430	58.42	1684	58.03	786	57.29
说不上	16	24.24	120	16.30	403	13.89	169	12.32
比较不幸福	11	16.66	73	9.92	275	9.48	135	9.84
非常不幸福	7	10.6	15	2.04	61	2.10	26	1.89
合计	66	100	736	100	2902	100	1372	100

资料来源: 2017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由表 3-4 可知, 在选择“非常幸福”的农村中老年父母中, 第一组中无子女父母的幸福感明显低于有孩子的父母的幸福感, 比例仅仅为 7.58%, 且低于全样

本 15.71%。第二组中，独生子女的父母感觉到幸福的比例低于多子女父母，同样也低于全样本，仅为 13.32%。反而是第三组两个孩子及其以上的父母感觉到幸福的比例更接近全样本，为 16.50%。第四组中三个孩子及其以上的父母感觉到“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为 18.66%。

表 3-3 中全样本中选择“比较幸福”是大多数农村中老年人的选择，比例为 57.8%。表 3-4 中，第二组中独生子女的父母感觉“比较幸福”的比例比其他三组都要高，为 58.42%，而且高于全样本比例。第一组无子女的父母感到“比较幸福”的比例最低，为 49.91%，有子女的三组中，第三组仅次于第二组的 58.03%，第四组的比例最低。

在选择“比较不幸福”和“非常不幸福”的农村中老年人中，第一组的比例最高。在有孩子的农村中老年人中，第二组中独生子女的农村中老年人父母情况最为糟糕，第四组其次，第三组比其他两组情况乐观一些。

综合分析来看，似乎有孩子的父母要比没有孩子的父母感觉到幸福情绪的比例更高。但从表 3-4 中可知，孩子并不是越多越好，两个孩子及其以上的农村中老年父母的幸福感整体上要好于独生子女父母和三个孩子以上的父母。

从理论角度来看，孩子数量对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存在两面性。孩子数量多，父母在中老年时，能够得到更多的照顾与陪伴，自身承担的养老成本更低一些，更少的感受到孤单和无聊，有些中老年人得享“天伦之乐”，精神状况方面心情会更好，能感觉到更幸福。但是同时孩子数量也存在负面影响，父母养育的子女数量越多，家族成员数量庞大，养育成本更高，精神压力大。更多的孩子需要付出更多的生活成本和教育成本，父母会在养育孩子期间承受较大的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而且孩子多的父母也会面临更多孩子和家庭成员之间的琐事与矛盾，父母处理子女和家庭的杂事分身乏术，无形之间会增加精神压力，降低父母对幸福感的感知度。所以，不同孩子数量对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取决于正效应和负效应之间的作用，因此幸福感水平也因人而异。

（二）实际孩子数量与理想子女数量的幸福感状况

表 3-2 中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来看，实际子女数量的均值为 2.3847，理想子女数量为 2.3850，是否能说明农村中老年人实际生养的孩子就是理想数量呢？由表 3-5 可知，无子女的农村中老年人父母幸福感是最低的，均值为 3.18，和上文分析情况相同，水平介于“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水平和“比较幸福”之间，情况不是特别差。在有子女的农村中老年父母中，实际子女数量少于理想子女的情况和实际等于理想的情况的幸福感更接近，实际子女数量少于理想子女数量的父母幸福感最高，实际子女数量多于理想子女数量的幸福感最低，从表中数据看，似乎是打破了传统中“多子多福”的观念。

表 3-5 实际与理想子女数量的统计描述

Table 3-5 Statistical description of the actual and ideal number of children

	无子女	有子女		
		实际少于理想	实际等于理想	实际多于理想
幸福感	3.18	3.789	3.774	3.69
实际子女数量	0	1.47	2	3.61
理想子女数量	2.38	2.81	2.397	1.921
样本数	66	835	2075	728

资料来源：2017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三）孩子性别与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

在表 3-2 的全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中，有无儿子变量的均值是 0.8629，标准差为 0.34411，这说明有 86.3% 的农村中老年人有儿子；实际儿子数量均值为 1.2873，与理想儿子数量 1.2522 接近；儿女双全变量的均值为 0.5753，标准差为 0.4944，说明农村中老年父母有 57.53% 的人是儿女都有的。在表 3-6 中，剔除无子女的样本 66 个，还有 3638 个有子女的样本。该表列出了全是儿子、全是女儿、和儿女双全这三种情况。从样本数量上看，全是儿子的样本有 1065 个，全是女儿的样本有 442 个，儿女双全的样本有 2131 个样本。

表 3-6 孩子性别与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比较

Table 3-6 Children's sex compared with the happiness of the elderly in rural areas

	全是儿子		全是女儿		儿女双全	
	频数	比例 (%)	频数	比例 (%)	频数	比例 (%)
非常幸福	152	14.27	55	12.44	370	17.36
比较幸福	621	58.31	276	62.44	1217	57.11
说不上	178	16.71	59	13.35	286	13.42
比较不幸福	92	8.64	45	10.18	211	9.90
非常不幸福	22	2.07	7	1.58	47	2.21
合计	1065	100	442	100	2131	100

资料来源：2017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从传统观念的角度来看，拥有儿子的情况似乎更能带给父母幸福感。一方面，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男孩偏好的现象较为普遍，人们认为儿子是自家人，承担着传宗接代的任务，为延续家族香火，因此很多家庭追求生儿子，甚至认为儿子数量越多越好。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养儿防老”和“传宗接代”

等传统观点有所转变，但仍有部分人还是相对传统，没有完全摆脱传统观点的束缚。再加上农村父母养儿防老意识根深蒂固，需要儿子给自己安养老送终，有些地区的女儿甚至没有资格参与安葬。另一方面，在农村中，因为农业生产是重体力劳动，需要男性作为劳动力，男性对父母和家庭来说很重要。男孩不仅能够为父母提供养老服务，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担任保护父母和家庭成员的角色，尤其是成年男性，能够对外人产生震慑和威慑力，保护家庭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拥有儿子满足需求，能提升幸福感，但同时，儿子其实也会给家庭带来成本，家庭要为儿子的婚姻家庭支付房子和彩礼，家庭要承担较重的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从而影响农村中老年父母的幸福感。

但在实际生活中，女儿在关心和照料老人方面有性别优势。农村地区全是女儿的家庭一般会招“上门女婿”，这类女婿通常会在婚前考虑清楚，婚后在与女方家人相处上更和谐，帮助女方处理事务，分担体力劳动。因此，这些也能够使得女儿促进父母的幸福感提升。

由表 3-6 的分析结果知，数据分析结果与理论分析不一致。感觉到“比较不幸福”和“非常不幸福”的农村中老年父母的频率分布中，全是儿子的情况最好，全是女儿次之，儿女双全的父母不幸福的情况最严重。但是感觉到“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的比例来看，全是女儿的幸福感最高，全是儿子的幸福感最差。

（四）控制变量

个人特征方面，性别均值为 0.4711，标准差为 0.4992；年龄均值为 60.2586，标准差为 10.1618，最小值为 45 岁，最大值为 95 岁；民族的样本均值为 0.9104；宗教信仰的样本均值为 0.1139，标准差为 0.3178；婚姻状况的均值为 0.8178，标准差为 0.3861；受教育程度的样本均值为 1.4171，标准差为 0.6404；政治面貌的平均值为 0.0499，标准差为 0.2179；住房情况的平均值为 0.5526，标准差为 0.4973；根据数据分析得出，所选取的全样本中，受访者多为女性；有 91% 的农村中老年人为汉族人；有宗教信仰的农村中老年人较少；大多数中老年人是在婚状态；多数农村中老年父母的受教育状况为初中及以下学历；党员占比仅为 4.99%；多数老人是拥有目前住房的产权。

主观评价变量包括：身体健康状况的样本均值为 3.0391，标准差为 1.1306；家庭经济情况的样本均值为 2.3493，标准差为 0.7591。数据显示，农村中老年人大多数自评的健康水平一般；家庭经济情况自评状况中，大多数农村中老年人自评家庭经济情况在中等及以下水平，说明农村中老年人的家庭经济状况有待提升和改进。

社会保障项目参与情况：养老保险（城市/农村基本养老保险）的样本均值为 0.7217，标准差为 0.4482；商业养老保险的样本均值为 0.0292，标准差为 0.1683。绝大多数的农村中老年人购买了基本养老保险，大部分人未购买商业养老保险。

第三章 子女数量对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影响研究的 实证分析

第一节 模型选择与构建

本文将运用模型分析进行实证回归以检验前文的统计性描述是否相符。本次选取的被解释变量为幸福感自评，在变量赋值时，本文将其划分为5个层次，即“非常不幸福=1，比较不幸福=2，说不上幸福不幸福=3，比较幸福=4，非常幸福=5”，为离散类变量，最终本文采取多元有序 Logit（Ordered Log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本文中的幸福感为有序多分类变量，为离散数据且有着天然排序，在比较了 multinomial Logit 和 OLS 以后，对于排序数据，最后选择使用潜变量法来推导 MLE 估计量，假设模型如下：

假设 $Happiness^* = x' \beta + \varepsilon$ (y^* 不可观测值)，

$$Happiness = \begin{cases} 1(\text{非常不幸福}), & \text{若 } Happiness^* \leq \gamma_1 \\ 2(\text{比较不幸福}), & \text{若 } \gamma_1 < Happiness^* \leq \gamma_2 \\ 3(\text{说不上幸福不幸福}), & \text{若 } \gamma_2 < Happiness^* \leq \gamma_3 \\ 4(\text{比较幸福}), & \text{若 } \gamma_3 < Happiness^* \leq \gamma_4 \\ 5(\text{非常幸福}), & \text{若 } \gamma_4 < Happiness^* \leq \gamma_5 \end{cases} \quad (4-1)$$

在上面公式中，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自评范围 1-5 是“切点”（cutoff points，stata 软件的输出结果其简称为“cut”），即为待估参数。

$$\begin{aligned} P(Happiness = 1|x) &= P(Happiness^* \leq \gamma_1|x) = P(x' \beta + \varepsilon \leq \gamma_1|x) \\ &= P(\varepsilon \leq \gamma_1 - x' \beta|x) = \Phi(\gamma_1 - x' \beta) \end{aligned} \quad (4-2)$$

$$\begin{aligned} P(Happiness = 2|x) &= P(\gamma_1 < Happiness^* \leq \gamma_2|x) \\ &= P(Happiness^* \leq \gamma_2|x) - P(Happiness^* \leq \gamma_1|x) \\ &= P(x' \beta + \varepsilon \leq \gamma_2|x) - P(x' \beta + \varepsilon \leq \gamma_1|x) \\ &= P(\varepsilon \leq \gamma_2 - x' \beta|x) - P(\varepsilon \leq \gamma_1 - x' \beta|x) \\ &= \Phi(\gamma_2 - x' \beta) - \Phi(\gamma_1 - x' \beta) \end{aligned} \quad (4-3)$$

$$P(\text{Happiness} = 3|x) = \Phi(\gamma_3 - x' \beta) - \Phi(\gamma_2 - x' \beta) \quad (4-4)$$

...

$$P(\text{Happiness} = 5|x) = 1 - \Phi(\gamma_4 - x' \beta) \quad (4-5)$$

通过以上公式，可以得到样本的似然函数，并可以通过计算得出 MLE 的估计量。我们假设模型中的扰动项服从逻辑分布，此时即可得出多元有序 Logit 模型。

第二节 共线性检验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子女数量和儿子数量对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影响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的因素还有农村中老年人的个体特征、主观评价、社会保障项目参与情况，所以本文加入了这些控制变量，目的是减少模型回归系数的误差的同时提高回归结果的解释效力。在多元回归时，必须要检验不同的解释变量之间的共线性情况，若模型存在多重共线性，则会导致模型出现失真等误差，最终导致模型回归的结果的可靠性降低。

共线性检验的标准为：VIF 值（方差膨胀系数）大于 1，小于 10，VIF 值越接近 1，共线性越轻，容忍度的值大于 0，小于 1，容忍度值越大，共线性越轻；反之，模型的共线性情况越严重。所以，本文在进行实证检验之前，对各变量进行的多重共线检验结果如下表。

表 4-1 共线性检验

Table 4-1 Collinearity test

变量	容忍差	VIF	变量	容忍差	VIF
实际子女数量	0.283093	3.53	婚姻状况	0.846691	1.18
子女数交互项	0.638048	1.57	受教育程度	0.829034	1.21
有无儿子	0.368203	2.72	政治面貌	0.916028	1.09
实际儿子数量	0.261860	3.82	住房情况	0.862639	1.16
儿子数交互项	0.621478	1.61	身体健康状况	0.875365	1.14
儿女双全	0.415974	2.40	家庭经济情况	0.891790	1.12
性别	0.804516	1.24	社保养老	0.984660	1.02
年龄	0.632672	1.58	商业养老保险	0.973797	1.03
宗教信仰	0.956897	1.05	Mean VIF		1.64

资料来源：2017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以上表 4-1 中的 VIF 检验, 是运用软件 Stata15.1 对变量进行容忍差和 VIF 计算。由表中数据可知, 所有变量中, 实际儿子数量的 VIF 值最大, 为 3.82, 其次是实际子女数量的 VIF 值, 为 3.53, 这实际儿子数量和实际子女数量两个变量之间是相关描述, 实际子女数量是由实际儿子数量与实际女儿数量加和得出, 以及有无儿子变量和儿女双全变量均是根据实际儿子数量和实际女儿数量判断得出, 所以这些变量的 VIF 的值偏大, 而且在回归分析中, 并不会将其同时在一个模型进行回归; 其余变量的 VIF 值均未超过 10, 均在 1-10 之间, 其中控制变量的 VIF 数值都小于 2, 整体平均 VIF 值为 1.64, 符合 0-10 之间的范畴。经数据分析得出结论, VIF 值是在合理范畴内的, 变量之间的共线性问题较小, 通过多重共线检验。

第三节 实证分析

一、实际子女数量对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

为研究子女总数量对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 本文中使用了同一种模型, 针对不同的核心解释变量分别进行回归。因两部分解释变量内容不同, 所以模型的样本量也不同, 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准确性, 本文在实证分析时加入了控制变量, 控制更多对幸福感影响的因素。具体在以下回归模型中具体说明。

(一) 全样本检验

本文在研究子女数量对农村中老年幸福感的影响中, 所用到的样本有 3704 个, 观察全样本中子女数量及控制变量对幸福感的影响情况。在研究子女数量对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影响的多元有序 Logit 回归模型中选取了性别、年龄、民族、宗教信仰、政治面貌、婚姻情况、受教育程度、住房情况、身体健康状况、家庭经济地位、社保养老、商业养老保险这些控制变量, 实证结果如见表 4-2:

表 4-2 子女数量对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影响的全样本回归结果

Table 4-2 Full-sample regression results on the effect of the number of children on the happiness of the elderly in rural areas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核心解释变量			
实际子女数量	0.0553 [*] (1.84)	0.0898 ^{***} (2.73)	0.2226 ^{***} (2.96)
实际与理想子女数		-0.0043 ^{**}	
关系变量		(-2.68)	
子女数平方项			-0.0275 ^{**} (-2.46)

控制变量	性别	-0.3248*** (-4.50)	-0.3257*** (-4.51)	-0.3219*** (-4.46)
年龄		0.0369*** (9.23)	0.0366*** (9.18)	0.0371*** (9.30)
民族		-0.4313*** (-3.63)	-0.4279*** (-3.69)	-0.4137*** (-3.57)
宗教信仰		-0.1592 (-1.54)	-0.1579 (-1.53)	-0.1523 (-1.47)
政治面貌		0.3653** (2.37)	0.3599** (2.33)	0.3695** (2.39)
住房情况		0.0597 (0.86)	0.0624 (0.90)	0.0637 (0.92)
婚姻情况		0.3588*** (3.97)	0.3402*** (3.75)	0.3274*** (3.58)
受教育程度		0.1222** (2.22)	0.1280** (2.32)	0.1241** (2.26)
身体健康状况		0.3715*** (11.77)	0.3740*** (11.84)	0.3739*** (11.83)
家庭经济情况		0.6720*** (14.40)	0.6661*** (14.26)	0.6664*** (14.26)
社保养老		0.0679 (0.94)	0.0707 (0.98)	0.0666 (0.92)
商业养老保险		0.4277** (2.22)	0.4333** (2.25)	0.4387** (2.28)
Pseudo R ²		0.0656	0.0664	0.0663
Log likelihood		-4151.1534	-4147.8942	-4148.3322
样本量		3704	3704	3704

注：表中***、**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水平下显著，括号中的数值为Z值。

根据全样本实证结果可以看出，为了研究子女具体数量对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程度，本文将实际子女数量作为自变量引入模型（1）中，实际子女数量变量对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之间的线性关系分析得出，实际子女数量变量在10%水平上显著，且与农村中老年人的幸福感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系数为0.0553，说明子女数量多，幸福感就高。但是否子女数量越多，幸福感就越高呢？根据描述性统计分析的表中发现，实际子女数量多于理想子女数量的农村中老年人幸福

感在有子女组中的比较中，幸福感是最低的，因此，模型（1）的结果不够有说服力。

所以，在模型（2）中，引入了实际与理想子女数量关系变量（即实际子女数量*（实际子女数量-理想子女数量）^2），来分析理想子女数量对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是否有约束。结果显示，引入实际与理想子女数量关系变量后，联合检验模型的P值为0，实际子女数量变量显著水平由10%提高到了1%，交互项的显著水平为5%，交互项系数为-0.0043，该关系变量和幸福感之间存在着负相关的关系。综合模型（2）数据分析，实际子女数量对农村中老年人的幸福感确实存在相关性，但是存在理想子女数量的约束，也就是说，只有农村中老年人希望有更多子女时，较多的实际子女数量会对其幸福感产生正向影响。但是并不是子女越多越好，由交互项为-0.0043看出，农村中老年人理想子女数量不是越多越好，实际子女数量与理想子女数量差距越大，幸福感就越低。

学者冯华超（2022）认为子女数量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倒U型”关系，为了验证本文子女数量和农村中老年幸福感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故模型（3）引入子女数平方项变量探究该变量与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实际子女数量在1%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实际子女数量系数为正；子女数平方项的系数为负（-0.0275），在5%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所以可以得出结论，实际子女数量和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

综合上文模型结果分析，基于马斯洛需求理论，人们不仅对孩子这一主体有需求，还有自己理想的子女数量，进一步追求“社会面子”被尊重等层面对孩子有需求。子女数量对农村中老年人全样本幸福感存在影响。代际交换理论中，年幼的孩子受到父母的抚养，在父母年老时，产生代际间的交换，希望得到子女赡养，这也需要养育孩子来实现；在家庭生育决策中，基于现有孩子的数量，父母会衡量正负效用，才会进一步决定生育数量。而现有数量的孩子给父母如果带来负效用超过心理、情感和养老等因素带来的正效用时，就会影响农村中老年父母的幸福感。因此，农村中老年人的幸福感会受到理想子女数量对实际子女数量的约束，实际子女数量和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之间存在的“倒U型”关系，幸福感会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幸福感达到最高，子女数量继续增加，幸福感则会下降。

（二）分群样本检验：中年群体和老年群体

为进一步研究子女数量对农村中老年人不同群体的影响状况是否相同，本文试图按照年龄把农村中老年人区分为两个群体，中年人样本群体年龄为45至59岁（1827个样本），老年人样本群体年龄为60岁以上（1877个样本）。

在具体分析过程中发现，中年人样本群体中的3个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均不显著，所以在正文分析中将其回归模型省略。原因分析如下：综合2017年的调查数据来看，农村的中年人大多出生于1972年后，农村中年人和老年人所处的时代背

景不同。农村老年人在当时，面临着工分制的劳动报酬制度，家里的人数越多，家庭能够获得越多的工分和资源，自然会希望拥有更多的子女数量。最初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在 1982 年被定为基本国策的，这时大部分老年人已经完成了自己的生育行为，理想子女数量就是其实际子女数量。所以，实际子女数量对农村老年人有显著影响。

而农村中年人这时已经受到国家生育政策约束和“晚婚晚育，少生优生”观念的宣传教育，思想观念区别于老年人。在分配制度变更的和农业生产过程机械化的进步的大背景下，家庭不需要太多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农村中年人行为选择后的实际子女数量不再追求数量上的多。“少生优生”理念发挥作用，加上家庭经济压力大，让更多的农村中年人在养育孩子时，更加注重孩子的质量，为给家庭和孩子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出现了子女质量对子女数量的替代现象，使得孩子数量对农村中年人的幸福感影响不显著。

农村老年人样本群体中的情况与全样本回归结果见表 4-3。模型（4）中实际子女数量变量在 5% 水平上显著，显著水平较全样本高；模型（5）中，实际子女数量的显著水平提高，说明理想子女数量制约实际子女数量对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而模型（6）中，实际子女数量和子女数平方项均显著，且实际子女数量系数为正，子女数平方项系数为负，说明子女数量对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倒 U 型”关系。

在控制变量中却发现，全样本中政治面貌和受教育程度两个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但是在老年人群体却不显著，说明农村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对其幸福感无显著影响。

表 4-3 实际子女数量对农村老年群体幸福感影响的回归结果

Table 4-3 Sample test of the effect of the number of sons on the happiness of the elderly in rural areas

变量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解释变量	实际子女数量	0.0714** (1.99)	0.1249*** (3.12)	0.3027*** (3.20)
	实际与理想子女数关系变量		-0.0053*** (-3.08)	
	子女数平方项			-0.0346*** (-2.68)
控制变量	性别	-0.2487*** (-2.49)	-0.2486** (-2.49)	-0.2414** (-2.42)
	年龄	0.0217***	0.0217***	0.0232***

	(2.85)	(2.85)	(3.03)
民族	-0.4845*** (-2.88)	-0.4954*** (-2.94)	-0.4765*** (-2.83)
宗教信仰	-0.2630* (-1.88)	-0.2536* (-1.82)	-0.2438* (-1.74)
政治面貌	0.2628 (1.30)	0.2520 (1.24)	0.2742 (1.35)
住房情况	-0.0550 (-0.58)	-0.0483 (-0.51)	-0.0453 (-0.48)
婚姻情况	0.2675** (2.48)	0.2382** (2.20)	0.2255** (2.07)
受教育程度	0.0910 (0.98)	0.1045 (1.13)	0.0932 (1.01)
身体健康状况	0.3151*** (7.29)	0.3175*** (7.34)	0.3172*** (7.33)
家庭经济情况	0.6381*** (10.15)	0.6255*** (9.93)	0.6253*** (9.91)
社保养老	-0.0165 (0.16)	-0.0264 (0.26)	-0.0230 (0.22)
商业养老保险	0.8556** (2.24)	0.8474** (2.21)	0.8648** (2.26)
Pseudo R ²	0.0563	0.0583	0.0578
Log likelihood	-2105.6978	-2101.3007	-2102.3649
样本量	1877	1877	1877

注：表中***、**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水平下显著，括号中的数值为Z值。

二、拓展研究：儿子数量对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

（一）全样本检验

在该部分检验中，考虑到有些样本存在既有儿子也有女儿的情况，也有无子女的情况，为更合理的观察子女性别偏好对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故剔除了无子女的样本，剩余样本数量为3638个。

表 4-4 全样本中儿子数量对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回归结果

Table 4-4 The number of sons in the whole sample returned to the happiness of the elderly in rural areas

变量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解释变量	有无儿子	0.0678 (0.67)			
	实际儿子数量		0.0098 (0.23)	0.0619 (1.34)	
	实际与理想儿子数变量			-0.0154*** (-2.76)	
	儿女双全				0.0752 (1.11)
控制变量	性别	-0.3213*** (-4.40)	-0.3202*** (-4.39)	-0.3165*** (-4.34)	-0.3210*** (-4.40)
	年龄	0.0392*** (10.59)	0.0392*** (10.11)	0.0393*** (10.15)	0.0387*** (10.37)
	民族	-0.4094*** (-3.52)	-0.4084*** (-3.51)	-0.4030*** (-3.46)	-0.4099*** (-3.52)
	宗教信仰	-0.1473 (-1.41)	-0.1464 (-1.41)	-0.1527 (-1.47)	-0.1486 (-1.43)
	政治面貌	0.3484** (2.25)	0.3493** (2.26)	0.3429** (2.21)	0.3501** (2.26)
	住房情况	0.0728 (1.03)	0.0702 (1.00)	0.0694 (0.98)	0.0704 (1.00)
	婚姻情况	0.3289*** (3.53)	0.3297*** (3.54)	0.3249*** (3.49)	0.3237*** (3.47)
	受教育程度	0.1163** (2.10)	0.1160** (2.09)	0.1217** (2.19)	0.1171** (2.11)
	身体健康状况	0.3673*** (11.57)	0.3672*** (11.56)	0.3653*** (11.50)	0.3678*** (11.59)
	家庭经济情况	0.6711*** (14.26)	0.6710*** (14.26)	0.6701*** (14.23)	0.6701*** (14.24)
	社保养老	0.0609 (0.84)	0.0615 (0.84)	0.0645 (0.88)	0.0633 (0.87)
	商业养老保险	0.4571**	0.4516**	0.4579**	0.4600**

	(2.36)	(2.33)	(2.37)	(2.38)
Pseudo R ²	0.0635	0.0634	0.0643	0.0636
Log likelihood	-4059.9583	-4060.1580	-4056.4831	-4059.5651
样本量	3638	3638	3638	3638

注：表中***、**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水平下显著，括号中的数值为Z值。

从表4-4中全样本回归结果来看，儿子数量的解释变量整体对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模型(7)中有无儿子变量未通过检验，说明在当时该全样本不存在儿子的“门槛效应”^②。模型(8)中实际儿子数量也未通过检验，但这些是否能说明不存在儿子的性别偏好的结果呢？为此，模型(9)中引入了儿子数交互项，儿子数量仍旧未通过检验，仅有儿子数量交互项对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在1%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说明理想儿子数量的约束对农村中老年人的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模型(10)中儿女双全变量也未通过检验。

（二）分群样本检验：中年群体与老年群体

为进一步探求农村中老年人不同年龄群体之间的性别偏好，进一步比较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受儿子数量的影响状况，还是将全样本按照年龄分为两组，分别是45-59岁中年人组（样本量为1799个）和60岁以上老年组（样本量为1839个）这两组。

回归发现中年人组中儿子数量中的解释变量均不显著，故省略该组回归结果。原因解释如下：孩子不仅能给中老年人带来物质层面的支持，也会带来精神层面的享受。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农村地区中老年人受教育程度相对提高，农村老年人的思想相对传统一些，仍然存在儿子的“门槛效应”，也会追求儿女双全的性别组合。中年人整体上较老年人受教育程度高，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农村中年人受到的性别观念教育和文化影响相较于老年人程度更深。

从养育成本上来讲，农村中年父母对儿子和女儿同样都需要付出。在子女未成年时，从出生后的“奶粉钱”到入学时的教育支出和生活费用等成本都是一笔不小的支出。而且子女在成年以后，无论是儿子还是女儿，父母都需要为其婚姻支付一笔费用，包括房屋购置、房屋装修、彩礼或者嫁妆费用等结婚相关费用。这种情况在农村独生子女家庭会出现，儿女一视同仁，儿子可以娶亲，女儿可招赘婿，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子女性别对农村中年人幸福感影响区别不大，不存在性别偏好。

农村老年人组的回归结果如表4-5。从模型(11)中可知，农村的老年人中存在儿子的“门槛效应”，有儿子的老年人比没有儿子的老年人更幸福；这可能和

^② 此处的“门槛效应”的表述，是参考学者郭志刚在中国高龄老人的居住方式及其影响因素一文中的研究结论：存活子女数从无到有具有突出的门槛效应，故借鉴其表达。

“重男轻女”的思想有关，通过生养男孩子来满足“传宗接代”的传统思想，同时满足个人和家庭的“社会面子”。但是模型（12）中儿子数量却没有通过检验；模型（13）中引入儿子交互项后发现实际儿子数量仍旧未通过检验，但是交互项却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理想儿子数量的约束会对农村老年人幸福感产生负向影响；模型（14）中，儿女双全变量在10%水平上通过检验，证实了儿女双全是农村老年人喜欢的子女性别组合，这也可能因为女儿的性别存在照顾中老年父母的优越性有关。

表 4-5 儿子数量对农村老年群体幸福感影响样本检验

Table 4-5 Sample test of the effect of son's number on the happiness of rural elderly groups

变量		模型（11）	模型（12）	模型（13）	模型（14）
解释变量	有无儿子	0.2873* (1.74)			
	实际儿子数量		-0.0010 (0.02)	0.0823 (1.42)	
	实际与理想儿 子数变量			-0.0188*** (-3.16)	
	儿女双全				0.1892* (1.94)
控制变量	性别	-0.2353** (-2.33)	-0.2375** (-2.35)	-0.2280** (-2.26)	-0.2357** (-2.34)
	年龄	0.0243*** (3.34)	0.0249*** (3.29)	0.0256*** (3.38)	0.0234*** (3.21)
	民族	-0.4777*** (-2.83)	-0.4833*** (-2.86)	-0.4646*** (-2.57)	-0.4834*** (-2.86)
	宗教信仰	-0.2437* (-1.73)	-0.2392* (-1.70)	-0.2464* (-1.75)	-0.2395* (-1.70)
	政治面貌	0.2527 (1.25)	0.2578 (1.27)	0.2413 (1.19)	0.2635 (1.30)
	住房情况	-0.0245 (-0.25)	-0.0381 (-0.39)	-0.0411 (-0.42)	-0.0389 (-0.41)
	婚姻情况	0.2290** (2.07)	0.2314** (2.09)	0.2268** (2.05)	0.2169* (1.95)
	受教育程度	0.0736 (0.79)	0.0763 (0.82)	0.0887 (0.95)	0.0793 (0.85)

身体健康状况	0.3198*** (7.33)	0.3168*** (7.26)	0.3120*** (7.14)	0.3189*** (7.31)
家庭经济情况	0.6314*** (9.97)	0.6325*** (10.00)	0.6305*** (9.95)	0.6304*** (9.96)
社保养老	0.0080 (0.08)	0.0054 (0.05)	0.0146 (0.14)	0.0156 (0.15)
商业养老保险	0.8957** (2.33)	0.8598** (2.24)	0.8713** (2.27)	0.8958** (2.34)
Pseudo R-2	0.0540	0.0533	0.0556	0.0542
Log likelihood	-2050.1001	-2051.6219	-2046.6800	-2049.7284
样本量	1839	1839	1839	1839

注：表中***、**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水平下显著，括号中的数值为Z值。

三、控制变量对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解释

在上述回归分析模型中加入的个人特征类、自我状况评价类和社会保障购买情况三类控制变量影响各不同。社会保障购买情况的变量中，社保养老的购买对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影响不显著，但是商业养老保险的购买对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影响正向显著，能够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农村中老年人的经济状况可能较好，有良好的经济基础为精神幸福奠定物质基础。

自评类变量中，身体健康状况和家庭经济情况自评变量对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在不同模型中都通过了1%显著水平下的检验。从一定程度上讲，农村中老年人身体越健康，幸福感就越高，这与学者张海峰（2020）的实证研究结果一致；家庭经济条件越好，幸福感也会越高。

整体上来看，性别和民族这两个变量与全样本的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是负相关的。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村中老年女性较男性有更高的幸福感，少数民族比汉族的幸福感更高。

第四节 稳健性检验

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子女数量对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并非单纯的线性关系，而是“倒U型”关系，对计量结果核心结论的“倒U型”关系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采用更换模型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分别采用OLS模型和Oprobit模型进行回归检验。结果如下：

表4-6 稳健性检验

Table 4-6 The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变量	幸福感		
	OLS	Oprobit	Ologit
核心解释变量：			
实际子女数量	0.0985*** (2.94)	0.1228*** (2.83)	0.2264*** (2.96)
实际子女数平方项	-0.1348*** (-2.65)	-0.0157** (-2.39)	-0.0275** (-2.4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常数项	1.4329		
F 值	47.63		
对数似然		-4147.7917	-4148.3322
观测值	3704	3704	3704
R ² / Pseudo R ²	0.1531	0.0664	0.0663

注：表中***、**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水平下显著，括号中的数值为Z值。

由表可知，使用 OLS 模型替代 Ologit 模型回归，将控制变量全部进行控制，对子女数量对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影响的“倒 U 型”检验通过，实际子女数量和实际子女数量平方项的系数分别为 0.0985 和-0.1348，一次项系数为正，二次项系数为负，符合“倒 U 型”关系，验证了基准模型 Ologit 模型的稳健性。

使用 Oprobit 模型对 Ologit 模型进行替换，对所有的控制变量进行控制，结果显示，实际子女数量和实际子女数量平方项的系数分别为 0.1228 和-0.0157，一次项系数为正，二次项系数为负，符合“倒 U 型”关系，验证了基准模型 Ologit 模型的稳健性。

第四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节 研究结论

本文在马斯洛需求理论、家庭生育理论、代际交换理论与忽视变量理论的机理分析下,运用 2017 年的 CGSS 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对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相关进行研究分析,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多元有序 Logit 计量模型的方法,对研究子女数量和性别对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分析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的探讨,实证检验通过了共线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综合本文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水平相对落后,综合子女数量和子女性别对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来看,儿子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村地区的中老年人的幸福感有影响,而且子女数量对农村地区中老年人幸福感起着决定性作用。

具体研究结论为:根据全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有子女和无子女的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在自评得分上有明显的区别,有子女的农村中老年人的幸福感比没有子女的更高,不同的子女数量的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也有所区别;进一步进行模型回归分析,验证了实际子女数量和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实际子女数量对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程度也有显著影响,其影响是在理想子女数量的约束下显著,说明农村中老年人还是有自我评选的最优数量,并不是孩子越多越好。

分群样本检验中发现,农村中年人的幸福感受到子女数量和儿子数量的影响不显著,但是农村老年人同时受到两者的影响,说明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不仅对子女数量有追求,对子女性别也有追求,有儿子的“门槛效应”,还会追求儿女双全的性别组合,只有儿女双全时,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最高。

第二节 政策建议

综合本文对 2017 年的统计数据中子女性别和子女数量对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分析,结合现实社会中农村中老年人所面临的现实状况,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全面放开生育政策,减轻子女养老负担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虽然有了一个质的改善。但现阶段农村地区中老年人养老主要依赖子女,基于人口出生率下降和老龄化程度的加深的现实状况,我国于 2016 年提出了“二胎政策”,2021 年提出全面开放三胎。从研究结果来看,子女数量对农村老年人幸福感影响显著,不仅受到理想子女数量的约束,而且对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倒 U 型”关系。现实情况中,理想孩子数量因人而异,基于此研究结果和生育决策理论,建议全面放开计划生育政策,让人们考

虑生育成本和经济效益，科学决策自己的孩子数量，即能满足自己对于理想孩子数量的追求，也能够在晚年享有更高的幸福感，同时，也能为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做出相应贡献。

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城市低，农村子女多数异地务工，再加上现阶段年轻人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大，如果农村中老年人养育的子女数量少，无法抽身顾及父母养老，父母则无法获得赡养。随着人均寿命提升和老龄化占比增加，当高龄老人年长的子女也步入老年，丧失劳动能力时，在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的情况下，可以有更年轻的后代给他们养老。老年人获得探望和赡养的机会就更大，这样年轻子女工作之余，总有后代抽出时间去探望照顾老人，加强子女对农村父母的精神关怀，缓解子女数量对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的冲击。

二、落实农村地区儿女同有继承权，共同承担赡养义务

根据本文以上分析发现农村中老年人全样本的幸福感对子女性别无显著偏好，农村老年样本群体存在儿子的“门槛效应”，也有儿女双全的性别组合的偏好，说明我国的性别观念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社会中重男轻女的现象。

从经济和社会地位方面来看，现阶段女性在社会工作参与度越来越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日益凸显，除了能给农村父母养老提供精神享受，也能够提供物质保障。但是农村地区，很多父母仍保有传统观念，认为女儿“出嫁”就是别家的人，不能继承家产，儿子则生来就有继承权，最后将承包地和宅基地留给儿子。儿子为父母养老的行为，在继承权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具有交换色彩，这也与学者费孝通的代际反馈理论和交换理论呼应，女儿为父母养老则是自愿的。很多父母想实现儿女双全，但是只想把财产给儿子继承，还要求女儿承担赡养义务，这无疑会伤害女儿为父母养老的积极性。

基于马斯洛需求理论和代际交换理论，本文建议，在现有的性别观念教育的成果的基础上，提倡儿女权责统一，共同享受继承权益，同时履行赡养老人的义务。即使不是儿女双全的情况下，农村父母能同时获得来自儿女的物质保障和精神安慰，提高女儿为农村父母养老的积极性和获得感。一方面，在法制层面上，完善法律法规，构建先进的性别文化，完善女性社会保障制度，更好的保障农村女性在继承权方面的权益；另一方面，利用新媒体和自媒体的宣传平台更新宣传手段，在营造性别平等社会氛围的同时，树立引领正确的继承意识和赡养意识，强化农村子女对父母的赡养意识，落实子女赡养义务，从而促进农村父母幸福感的提升。

三、提高养老行业服务标准，对农村养老机构进行规范化管理

从文中分析可以看出，无子女的农村老年人幸福感很低，其中也有一部分未

婚或丧偶的农村中老年人，他们的养老需要依靠社会实现。独生子女父母幸福感次低，有子女的农村中老年人养老主要还是依靠子女。但是年轻子女为了生计跨地区就业，使得主要依靠子女养老的农村中老年人无法及时的得到子女的照料，无法依靠传统家庭解决农村留守中老年人养老问题。虽然农村居民具有自我养老意识，子女照顾不到他们时，健康的中老年人依靠自己的能力或者配偶相互扶持养老，但是身体机能差的老人生活需要依靠邻里帮助来实现，这样的养老方式会降低幸福感。农村的养老机构近几年有所发展，机构数量在增加，主要是政府主导的养老院和托老院，但与养老机构相关的负面新闻屡见不鲜。

因此，政府应该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养老体系的建设，对养老行业要既要引导建立，也要严格监管。实现农村留守的中老年人和孤寡老人的养老问题的解决，使农村中老年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养。养老机构能够作为子女赡养父母的中间工具，子女异地务工获得经济来源，再投入到养老机构为父母换取赡养服务。为异地子女给父母养老打通中间渠道，既能避免儿女琐事的叨扰，又可以享受高质量的养老服务，为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的提升奠定社会基础。

将用于民生方面的资金向农村养老院和托老机构倾斜，对已有的养老机构进行改善，完善基础设施，强化养老机构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从而实现服务农村中老年人养老能力的提高，间接为子女实现赡养义务，推动产生农村中老年人的幸福感。

四、拓宽农民收入渠道，创新养老方式

根据本文控制变量的分析来看，农民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经济状况对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影响非常显著，工作状况未对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综合以上分析，建议国家和政府在发展农村经济的同时，拓宽农民收入的收入渠道，在现有的自我养老、子女养老、养老机构等农村养老方式的基础上，探索“以房养老”、“农民退休制度”、“以地养老”等养老方式。

农地本质上就是为农民服务的，农民依靠土地获得生活和生产资料，但是仅凭土地来养老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本文提出在保障农民权益情况下，完善土地流转制度，释放农村土地活力，“以地养老”，实现土地的经济价值，使农民能够依靠土地流转实现增收，为养老奠定经济基础，减轻自己和子女的养老负担。

目前城市中存在“以房养老”的养老方式，分析过程中发现住房产权对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影响并不显著，是否能探索盘活农村的住房产权，从而为这个群体养老发挥作用，提高其幸福感。

“农民退休制度”概念中，“退休”多是指职业的人从现有的工作岗位中退出，领取退休金的情况。现阶段我国在促进高素质农民的发展，培育出了一批职业农民，但职业农民在农民群体中占比较小，“农民退休制度”在实现上也存在农民身

份多元、土地归属和城乡养老保险金制度安排不同的障碍，该养老的方式有待进一步研究。

五、推动保险制度协作，社保商保相辅相成

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商业养老保险的购买情况对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影响显著，农村社保养老的购买情况对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却不显著，子女数量却对农村老年人幸福感影响显著，这可能与农村的社会保障不足有关，子女数量需要补充社会保障不足的缺位。

农村基本养老保险方面，由于农村居民自身经济条件和认知有限，大多数农村人选择的是最低档次投保，农村基本养老保险给农村老年人发放的养老金数额不高，不能满足农民养老需求，甚至无法对其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而购买商业保险的农村中老年人虽然能显著正向影响农村中老年人的幸福感，但购买者人数占比较少。

因此建议政府要推动基本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协作，将商业保险的主体引入到民生保障领域，探索协同合作。同时，需要政府继续深化改革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结合农村地区的实际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状况，适度提高养老保险待遇，在保证农民的生活水平不会因为提高养老金缴纳档次而降低其生活质量的基础上，提高农村养老金的福利性，使得农民更有获得感，增强生活的信心，从而提高幸福感，同时也能提高农村养老保险的参保率。保险制度协作，更好的发挥商业养老保险对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提升的积极作用。

六、丰富农村精神文化生活，提高居民健康水平

从政治面貌变量在子女数量和儿子数量模型中的对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来看，共产党员的身份一定程度上会增强农村中老年人的幸福感，所以，要注重基层党建活动对农村居民意识和精神层面的影响。依靠各地农村的党支部，组织举办当地中老年人喜闻乐见的活动，鼓励广大农民参与，使其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精神文化的熏陶。

另一方面，农村的娱乐文化设施不足；精神文化生活单一且枯燥，在走访调研过程中发现，有很多农民的娱乐方式就是打麻将；农村留守人员老龄化严重，无法参与基层精神文化活动。因此要进一步建设和完善农村的文化娱乐设施，不仅要考虑为青壮年服务的体育设施和乡村图书馆，也应该从中老年人实际状况出发，加大资金投入，创新活动方式，为其普及手机和网络的使用方式；培养中老年人的业余爱好，有益于中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从而提高其幸福感。

而农村的中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对幸福感影响显著，结合农村地区实际状况，因地制宜，多关注低收入群体，满足不同群体对健康医疗知识的需求。同时医疗机构和社会群体可以给农村居民普及健康知识，定期组织公益性体检，强化农民

的健康意识，提高中老年人的健康水平，未提升农村中老年人的幸福感奠定健康的身体基础。

第三节 研究展望

本文在研究时，受限客观条件和科研能力的限制，采用的实证方法较为简单，虽然从子女数量的角度对农村中老年人的幸福感进行了探索，但仍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在文献阅读的过程中发现，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子女数量和子女性别对农村地区中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有所区别，这可能与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有关。本文采用的是截面数据，而且近年提出了新的生育政策，后期数据刊发完整后可以采用时间序列数据研究比较不同时期子女数量和性别对农村中老年群体幸福感的影响状况。

其次，生育决策理论中提到子女质量对子女数量有替代作用，在人们看重子女质量时，是否还存在性别偏好或者对性别偏好具有替代性，进而对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进行深层次的影响因素探究。

最后，由于客观原因，本研究缺乏子女居住距离和子女社会经济特征数据，未来的研究者可以将这些因素加入综合考虑子女数量对农村中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分析。

致 谢

毕业论文至此已经告一段落，也意味着自己即将告别校园学生的身份。回望过去，自己有大半时光在校园度过，都说大学校园时光是人生中最自由的一段时间，虽然这期间经历疫情，但也弥足珍贵。

首先，感谢我的恩师谢云副教授的悉心指导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因为自己是跨考到农硕，谢老师最初就给我推荐了农业经济管理相关书籍，补充未学习过的知识，从而为三年的学习打下基础。在学习过程中，谢老师总是及时的对我关心与指导，关心我们的生活和情绪，分享学术会议以及论文阅读方法，叮嘱我要多学习优秀论文，培养学术研究的敏感度。在期刊论文写作期间，谢老师会指出论文中的问题，有批判也有耐心的建议，一稿又一稿地帮我仔细修改，最后完成文章修改并且被录用，让我感觉到自己的成果终于被肯定。深刻体会到谢老师经常和我说的话，“学术可以慢慢来，但是一定要坚持，最后你就会发现，事情完成了，自己也有很大的收获。”所有的努力都不会被浪费，是老师的鼓励与肯定陪伴着我一路成长，从学术的门外汉不断进步。谢老师总是为我争取实地调研的机会，是学习也是锻炼，带我去看农村经济社会最真实的面貌，也锻炼了我的沟通和人际交往能力。谢老师还有很多闪光点值得我去学习，她在我的学习与生活中给予了极大的帮助，非常感谢恩师谢云老师。

其次，感谢在论文开题与写作过程中给予建议和指导的樊帆书记、刘在洲老师、朱忠贵老师、吴雪莲老师和童伟伟老师，是他们的建议让我的学位论文有了更加合理的结构与方向。感谢经济与管理学院中所有给予的帮助和机会的所有老师，感谢带我参与调研项目并为我答疑解惑的吴学兵老师、李林威老师；感谢学院的徐辉院长、刘玉成老师、张佳老师、谭露老师、马伦姣老师以及所有的授课老师，正是老师们在课堂上的讲解与点拨，让我的研究方向和内容更加明确。感谢为我们学生进行管理与服务的王中梅书记、朱翠玲老师、余晶晶老师和谢本贵老师，我的学生生活才能如此安稳有序。

同时与我一起走过三年时光的，有我同学和朋友。同门的姚志师兄，是师门的骄傲，也是我们的学习榜样，总是及时的给我们论文写作建议，给我们推荐工具书，为我们的论文写作进行答疑。李薇学妹教我使用 stata15.1 软件和模型解释，在论文实证部分给予了极大的帮助。还有已经参加工作的朋友，在我情绪低落时及时给予鼓励和安慰；师兄师姐对我求职给予了莫大的帮助，还有在生活上给予帮助的兰兰学妹，总是帮我处理自习室里没来得及做的事情。最后，还有感谢黄山、李超、曹佳玲、李雪莲、廖燕、谢世钊、刘晓钰等同学的陪伴，祝大家前程似锦，未来可期。

最后也是最感谢的人，就是我的父母，他们对我的读研生活给予了莫大的支

持，生活上的关心、物质上的付出、情绪上的理解和鼓励。他们是我的源动力、也是我的避风港，理解我的难处，也开心着我的开心。最后感谢不放弃的自己，一直在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参 考 文 献

- [1]Diener E, Emmons R A, Larsen R J, et al.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1985, 49(1):71-75.
- [2]Johnson D C S M . Avowed happiness as an overall assessment of the quality of life[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978, 5(4):475-492.
- [3]Watson D, Clark L A, Tellegen A. et al.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Brief Measure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 the Panas Scales. J Pers Soc Psychol[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8, 54(6):1063-1070.
- [4]Luis Angeles. Children and Life Satisfaction[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10, 11(4) : 523-538.
- [5] Hessami Z. The Size and Composition of Government Spending in Europe and Its Impact on Well-Being[J]. MPRA Paper, 2010, 63(3):346–382.
- [6] Shimai S, Yamamiya Y, Fukuda S. Subjective happiness among Japanese adults: An upward tendency associated with age[J]. Nihon Koshu Eisei Zasshi. 2018;65(9):553-562. Japanese. doi: 10.11236/jph.65.9_553. PMID: 30587678.
- [7]Oswald A J. Happines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J]. Economic Journal, 1997, 107, 1815-1831.
- [8]Easterlin R A.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J]. Nations &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1974:89-125.
- [9]George J M, Brief A P. Feeling good-doing good: a conceptual analysis of the mood at work-organizational spontaneity relationship[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2, 112(2):310-329.
- [10]Clark A E. The positive externalities of higher unemployment: Evidence from household data[D]. 1998.
- [11]Kahneman D, Deaton A. High income improves evaluation of life but not emotional well-being[J]. Proc Natl Acad Sci USA. 2010 Sep21;107(38):16489-93.
- [12]Dooley D, Catalano R, Wilson G. Depression and Unemployment: Panel Findings from the Epidemiologic Catchment Area Study[J].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994, 22(6):745-765.
- [13]Diener E, Suh E. Measuring quality of life: Economic Social, and subjective indicators[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997, 40,189-216.
- [14]Diener E, Suh S E. Subjective Well-Being Is Essential to Well-Being[J]. Psychological Inquiry, 1998, 9(1):33-37.
- [15] Shah SA, Safian N, Ahmad S, et 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Happiness among

- Malaysian Elderly[J]. Int J Environ Res Public Health. 2021 Apr 6;18(7):3831.
- [16]Kozma A, Stones M J. The Measurement of Happiness: Development of the Memorial University of Newfoundland Scale of Happiness (MUNSH)[J]. Journal of Gerontology,1980,35(6):906-912.
- [17] 段建华.主观幸福感概述[J].心理学动态,1996(01):46-51.
- [18]吴宁,戴俊明.居民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概述[J].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2019,14(1):48-52.
- [19]尉敏琦,邬家杰,沈婕等.上海市闵行区企事业单位职工主观幸福感现状及影响因素[J].环境与职业医学,2020,37(12):1200-1205.
- [20]白志远,亓寿伟.收入门槛、相对剥夺与老年人幸福感[J].财贸经济,2017,v.38;No.426(05):20-33.
- [21]亓寿伟,周少甫.收入、健康与医疗保险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J].公共管理学报,2010,7(01):100-107+127-128.
- [22]吴菁,黄慧敏.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安徽省为例[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10(01):24-26.
- [23]张莉.中国高龄老人的居住安排、代际关系和主观幸福感——基于对 CLHLS 数据的分析[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05):68-73.
- [24]陈璐,熊毛毛.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幸福效应[J].社会保障研究,2020(05):51-62.
- [25]魏强,苏寒云,吕静等.家庭规模、社会支持、健康状况对农村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J].西北人口,2020,41(05):106-115.
- [26]陈东,张郁杨.不同养老模式对我国农村老年群体幸福感的影响分析——基于 CHARLS 基线数据的实证检验[J].农业技术经济,2015(04):78-89.
- [27]李莫馳,李萌垚,张梦雅等.北京市老年人娱乐方式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1,31(04):675-677.
- [28]王武林.中国老年人的宗教信仰与主观幸福感[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2,32(12):2569-2572.
- [29]唐金泉.代际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年龄组的差异性分析[J].南方人口,2016,31(02):60-70.
- [30]李磊,刘鹏程,孙婳.男性与女性,谁更幸福[J].统计研究,2017,34(07):82-93.
- [31] 孙凤. 性别、职业与主观幸福感[J].经济科学. 2007(01)
- [32]向运华,李雯铮.教育影响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总体效应与机制[J].兰州学刊,2020(07):169-179.
- [33]徐福芝,陈建伟.婚姻状态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J].西北人口,2020,41(01):53-62.
- [34]周晓光.农村未婚老人的生活质量及提升对策研究 [J].中国软科学,2021(01):174-183.

- [35]张再生,达娃,杨若愚.宗教信仰、社会支持与居民幸福感——基于 CGSS2015 数据的实证研究[J]. 世界宗教文化,2018,(03):83-87.
- [36]王健,孟庆跃,Winnie Yip 等.农村居民日常活动的主观幸福感分析[J]. 山东大学学报(医学版),2009,47(06):118-120+123.
- [37]王晓慧.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42(03):92-100.
- [38]苏钟萍,张应良.收入水平、社会公平认知与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J].统计与决策:1-5[2021-04-18].
- [39]李芳芝,张焕明.代际流动影响主观幸福感吗?——基于 CGSS2015 的经验证据 [J].统计研究,2021,38(03):107-121.
- [40]张文超,吴远洋,杨华磊.志愿服务、年龄差异与主观幸福感[J].南方经济,2021(03):106-124.
- [41]彭春花,陈有国,萧贝蒂.时间观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J].护理研究,2020,34(23):4240-4243.
- [42]资树荣,张姣君.文化消费活动提升了农村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吗?——基于 CGSS 数据的实证分析[J].消费经济,2020,36(06):56-65.
- [43]张欣. 子女数量、子女社会经济地位对中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7.
- [44]谭远发,权力.子女数量与质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J].西部发展研究,2020(01):57-73.
- [45]闫晓娜.基于面板数据分析代际关系对农村中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D].山东大学,2015.
- [46]宫汝娜,张涛.子女数量对家庭生活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二孩家庭消费视角的分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2020(09):72-75+178.
- [47]孙晓冬,赖凯声.子女性别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J].青年研究,2020(05):14-23+94.
- [48]陆方文,刘国恩,李辉文. 子女性别与父母幸福感 [J]. 经济研究,2017,52(10):173-188.
- [49]李雯铮.生育女儿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J]. 西北人口,2019,40(01):93-102.
- [50]刘生龙,胡鞍钢,张晓明.多子多福?子女数量对农村老年人精神状况的影响[J].中国农村经济,2020(08):69-84.
- [51]高建新,左冬梅.儿女教育程度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J].中国老年学杂志,2009,29(23):3092-3095.
- [52]彭开丽,杨宸.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基于文化消费行为中介变量的实证分析[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06):37-45.
- [53]崔红志.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 8 省(区)农户问卷

- 调查数据[J]. 中国农村经济,2015,(04):72-80.
- [54]张凌霜,易行健,杨碧云.共同富裕目标背景下的商业保险、数字经济与人民幸福感: 来自住户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J]. 金融经济学研究,2022,37(01):42-60.
- [55]赵一凡,周金娥.新农保是否使中老年人生活更幸福——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 中国经济问题,2021,(06):105-122.
- [56]张海峰,林细细,张铭洪. “二孩政策”对父母老年阶段生活幸福感的影响[J]. 西北人口,2020,41(04):90-103.

